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24 期 2014 年 2 月 15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u>新年寄语（诗三首）·高野</u>	2
<u>反右的指标——历史上的三个花絮·丁弘</u>	5
<u>南通有个王子昌——三一八惨案的“第九位烈士”·丁弘</u>	6
<u>“丰收喜悦”的背后·何蜀</u>	7
<u>一个“右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的经历·杨宝智</u>	9
<u>潘虹日记（一则）·</u>	32
<u>“偷”一支钢笔，“判”十八年劳教·谭松</u>	35
<u>逸闻佚名</u>	37
<u>这样的土匪(散文)·它山</u>	39
<u>石板坡看守所·牛立华</u>	50
<u>曲、词各一首·胡开云</u>	54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126.com

新年寄语（诗三首）

高 野

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给难友的一封信

在我们一些小雅人看来，政治是野蛮的、

卑鄙的、肮脏的，至少是无趣的。

其实，凌辱与被凌辱，损害与被损害，

宰割与被宰割，一无例外地都属于政治。

——林贤治

那些年，“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曾被狂风刮倒，重又爬起

至今，我的身板还歪歪斜斜

那是当年被风吹折留下的痕迹

当年我远离政治，政治却找到我

现在政治远离我，我却要寻找政治

我们被政治伤害、委屈一辈子

我们既然从政治中来，就要到政治中去

我们是新时代的蒙难者，被划为另类分子

活像个政治的盲人，稀里糊涂被人欺

当了一辈子的任人使用的螺丝钉

当了一辈子甘心情愿的“驯服工具”

到头来仍然被歧视被清洗被打击

只因为我们活在风雨逞狂的上世纪

没有不受恐惧的自由，身不由己

如今老了，该是大梦初醒的年纪

我们真的老了，活过了八十好几

剩下的生命时光已经不太宽裕

无可奈何，只能自己解放自己
也好不辜负我们含辛茹苦的贱民经历
我们老是老了
但也要努力做个“两头真”的明白人
荫庇子孙后代过上政治清明的好日子
也图过，最后地含笑如愿地离开人世

2013年5月太原会晤时留诗

2014年元月改为新年寄语

新时代蒙难者之家

——写给《巴山夜雨》民刊

我们一无所有，除了思索

只有思索对抗可怕的遗忘

——林贤治诗句①

灯下，细读了民刊《巴山夜雨》
杂志的内容，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
使我久久浸沉在半个世纪的往事烟云里
仿佛重返了一趟荒唐屈辱的一九五七——
“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军队”②
这是“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重大胜利
胜利方，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下打起三面红旗
失败方，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知识分子

我们谁也不能忘记
那个著名的“毛/皮”关系的比喻③
我们这些多如毫毛的知识分子
被迫剥离了所依附的亲如爹娘的皮
把我们的角色转换为新中国的蒙难者
沿着历代忠谏之士的脚印开赴流放地
不是长寿湖就是夹边沟，或者是提篮监狱
总之，55万失败大军走向中国特色的古拉格岛屿

五七反右运动，不仅仅是一桩冤假错案
在国际舞台上，也被公认为“五七悲剧”
虽然这场发生在 57 年前的悲剧早已落幕
它对我们的重大骚动，永远也不会忘记
淅淅沥沥的“巴山夜雨”之声
就是向后代们继续解读这个悲剧的幸存者之家
若我们不论有效地制止悲剧重演
那才是天下真真正正的特大悲剧

2013-2014 元旦试笔于西安

【签注】①诗前题记两行，是摘抄林贤治 500 行长诗《悲剧的诞生》中的诗句。我曾广泛地向学生们推荐过。

②这条语录，是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对中国反右运动的成功经验做过这样的总结，归结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次胜利。

③毛与皮的比喻，也是一条毛泽东语录。曾经上过“毛选”，意思是知识分子是“毛”，依附在中共的皮上，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体肤上捋不顺的毛清除出去。此程序，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一个无缘无故的世界

——2014 年畅想曲

谁此刻在世上某处死

在世上无缘无故的死

都在望着我。

——里克尔《千钧一发》

有人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说法太武断，我不信
我有累累伤痕为证和血泪的教训
太平世上，我曾经无缘无故地变为敌人
同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里
无缘无故地被划分为猎物和猎人
仅仅因为我身上长着鲜艳的毛皮

无罪却重罚二十年的囚禁
再强悍的猎物也早已丧失了青春

有人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话不投机，我不理解
只知世上有仁道主义和人类博爱
只知世上有沧海桑田和春暖花开
当我遇到险阻或是什么灾害
就会有人无缘无故的向我走来
给我送来温暖送来友爱
他们都是非亲非故
我只知他们情深似海
促使大地无缘无故的春暖花开

2013年12月12日止园参观草拟

反右的指标

——历史上的三个花絮

丁 弘

一

《炎黄春秋》的杜导正先生说：曾彦修原来是康生的秘书。反右时，他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人民出版社打右派的任务是十二个，划到十一个的时候，划不下去了。你看曾彦修，在紧要关头，人家的品德就表现出来了。他把自己划成了右派。我就不如他。

我只知道曾彦修会写杂文，来过南通。前月寄赠《天堂往事录》上下册，这是一部极为厚重的书。

二

南通教育局长马骏，在反右时他看来看去，自己的单位里没有右派，都是好同志，如实汇报：“我们这里没有右派。”最后上级说，“你这个说法就是右派言论，你就是右派。”于是他真的戴上了右派帽子，下放劳动改造。二十年后平反，出任老年大学校长。他是一位书法家，以小楷条幅《醉翁亭记》相赠。

临终前，他一吐胸臆，说：他应该千刀万剐。

三

南通日报划出两个右派：一个是总编王子昌，一个是文艺组长谢望族。报社当时四五十人，按百分之三的指标，应该是可以了。上边忽然说：“你们还少一个，因为报社印刷厂的职员也是知识分子，你们应该是三个右派。”

这时，反右运动已经收兵。怎么办？总支书记杨卓如把文艺编辑张才福喊来，他说：“你和谢望族的关系好，观点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你没有鸣放什么，实质上也是右派。”张才福不免大惊。他说：“我又没说什么，也没有人揭发我什么。”老杨说：“你还是老实一点好，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你是一个小右派，我可以早点给你摘帽子。”张才福知道抵抗就要罪加一等，王子昌就是因为不服，右派成了极右。他什么也不说，戴着帽子下农村。老杨倒也说话算数，较早给他摘了帽子。张才福受到教育，从此不多言语。

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近距离的朋友，我并没有去有意采访收集这些材料。

南通有个王子昌

——三一八惨案的“第九位烈士”

丁 弘

1946年震动全国的南通“三一八”惨案，有八位烈士。当年与烈士常在一起活动的王子昌（原名范恒）一时也不见了，大家认为他也牺牲了，也成了烈士了。在“三一八”那次运动中，出人意料他躲过了一劫。

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烈士”一般的是指牺牲了的，活着的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烈士呢？曹孟德就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可以扩大一点的。可能本意即如此。

王子昌后来的身影，以正确的方向，激烈的冲突，沉重的氛围和烈士的情怀，终其一生。他不失为南通的一个真正的烈士！在1946年的那次事件中，他是幸存者。比当时牺牲的八位烈士，他后来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更多历史的印记和感召。

因此，我接到电话通知：“三一八要到了，市里要召开一个座谈会，包括缅怀王子昌。”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使王子昌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儿略记二三事：

1956年，《南通日报》总编办公室是三张办公桌。一张是他这位总编辑的；一张是党总支书记杨卓如的；一张是我的。一时三个编委。我和老王是所谓零距离。

党一直高举马列的旗帜。在我一生的眼界所及，看到认真读马列著作的就是王子昌。《资本论》很难懂，他花工夫认真地啃。他忙于报纸的编辑工作，还在思考理论，想进行一些启蒙工作，撰写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书。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总编辑。我在报社几十年，前后碰到多位总编辑。有挂名的总编辑；有认真工作，甘为孺子牛的总编辑；也有不务正业的；还有造反有理，造成报纸不得不停刊七年之久，使南通市一步退到报业史的史前时代的。

所以，王子昌在南通新闻界的历史中，地位可见。如果天假以年，他在理论上肯定会有大的成就。因为，他不仅有聪颖的天赋，而且他正直，具有使命感。

他有多方面的兴趣和过人的天资，居然可以推广世界语。他要为人类作贡献，认为这是促进地球村人类进步的手段。他热爱美术，大画家范曾是他的弟弟，比他小十多岁。童年时，耳濡目染当从他有所启发，所以范曾热爱他的哥哥。我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如《苏加诺藏画集》，大开眼界。我们的最后诀别，他坐在桌前，桌上玻璃板下就是八张速写、风景画。每张有诗描述。我一看画，他给我一一朗诵诗篇，别无一言。他不便说什么，因为他作为“右派”，必需定期汇报自己的一切活动，可能怕影响我。而我，则可以向他报告其子女在农村和我一起生活的情况。这就构成了我们相聚的合法性。片刻后，默然一别，不期却是永诀。

漫长而凄苦的右派生涯，是他一生最后的十五年，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篇章。这沉重的付出，我们应该珍惜。恩格斯说，从教训中学习，是最有意义的。他以鲜活的生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益。

划他为右派是两个理由：

一、他说：“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还应该是人民的喉舌。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要有知识性、趣味性，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提出了一个人民性的概念，被认为是妄图以人民性来削弱和否定党性。持这一观点的，都被划成了“右派”。建国以后，这是全国新闻界的第一重要话题。到了八十年代，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有《和胡乔木辩论十年》一书，还是争论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没有人民性，谈不到党性。”是啊，是党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党服务？就是到今天，在实践中，报纸工作还转不过弯来。当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决定的。而王子昌，以血肉之躯，担负了这个重担，由于他思想的睿智和先进。

会上，宣布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他不服，悲愤难抑，高呼口号：“我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声震屋宇，实是划破了历史长空的巨响。二十年后，果然平反，恢复党籍，但这时王子昌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二、是他居然和领导平起平坐。上级来了人。他说：“你们应该经常来嘛。”没大没小，出语不恭。“反右”开始后，省里有电话，“这个人怎么能不是右派！”地方感到大的压力。有些人想帮王讲话，讲不进去了，而根本原因，在于划“右派”有指标任务。

从实质上讲，这是平等、民主、自由的意识和专制的、封建的等级观点的碰撞。这一个平常的思想火花，叫王子昌承担了严重的后果。

“文革”之中，王子昌因被吊打，心身受到了严重摧残，亡故于1972年。

他的悲剧人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戴了右派帽子后，下放工厂劳动，后来安排到图书馆做勤杂工，他利用这一机会撰写了《匈奴史》，还力争作一些贡献。为此有人上书抗议说：居然给“右派”提供放毒的机会。于是重新下放工厂劳动改造，一年又一年。他在工厂的劳动改造中负伤。劳动期间，他学习机械知识，还为工厂搞了一些技术革新。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得粉碎。他不仅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和勤奋工作，而政治操守，更是高风亮节。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居于前列的共产党员，一个学者型的、不可多得的党报总编辑。他以血肉之躯承担了历史的重担，验证了历

史发展的残酷的阶段性。

南通有这样一个王子昌，我们不会忘记他。
值此王子昌去世四十周年之际，书此作为纪念。

012年3月5日

“丰收喜悦”

的背后

何 蜀



我母亲这张抱着刚割下的谷子，表现丰收喜悦的照片，曾在四川省林业厅办的下放干部成果展览中展出过。从照片上看，我母亲满面笑容，喜气洋洋，正表现出那个“大跃进”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不过，在这表情背后，我母亲却另有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

母亲是1958年“三八”节后被作为“下放干部”打发到重庆远郊南桐矿区（后改称万盛区）农村去的，当时我父亲已被打成“右派”，因此她只能规规矩矩听从安排。她是中央林业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托儿所的老师，因他们单位人少，是跟重庆市市中区的一批教师一起下放的。

南桐矿区是高寒山区，除了煤矿以外，农村十分贫穷。他们下去后就被安排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过，大概因居住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住到农民家中，而是集体住宿，但吃饭则是分派到每户农家去吃。我母亲被分派到一家“工属”（农妇的丈夫是矿工）家去吃饭。农民吃得十分简单，有时是煮的带糠壳的饭，咀嚼时满嘴“嚓嚓”响，难以下咽，吃下去后解大使很困难。有时就是一点菜叶子加几粒米煮的清稀饭，农民可以吃几大碗，而我母亲却只吃得下一两碗，当然就得饿肚子了。

当时他们参加农村的各种劳动，挖地是挖那种板结得很硬的土，还要栽秧、拔谷、挑水……我母亲最紧张的是背当地那种高高的尖底背篼走山路，有时路两边都是悬崖……每天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可以想见生活的艰难。那时还没到大饥荒时期，但是“下放干部”们就先已体会到了挨饿的滋味。带队领导还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上街去吃饭，农民会认出谁是下放干部的，影响不好。当时的这些“下放干部”都很老实，一般也就不敢上街去吃饭了。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我母亲才和一两个同事相约，悄悄在天黑以后去乡场上买点东西吃。直到他们那批“下放干部”饿得许多人都病倒了之后，领导怕出事，才把他们集中到南天门农场自己开伙。

在这期间，一些被定下了“右派”罪名的干部也陆续被下放下来了，他们不同于下放干

部的是，他们是来“劳动改造”，而“下放干部”是“劳动锻炼”。

给我母亲留下很深印象的有这样一件事：

一个“右派”，是重庆城里一所中学的教师，下来后，在这里的“下放干部”中找到了他妻子（也是一个教师），夫妻俩在妻子住处小聚，妻子煮了一顿饭给丈夫吃。此事被领导知道了，马上召开了批判会，要那位当妻子的作检查，因为她没有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那位可怜的妻子只好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检查”。事后不久，因一些干部又累又饿病倒了，而当地又缺医少药，于是，经领导批准，可以回重庆城去看病。回城当然就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了，一些人就想办法装病。

那位“右派”教师身体好，怎么装病呢？他就用红药水抹在草纸上，谎称“痔疮”发了，他也获准回城看病。走之前，他对妻子说了装病的事。不幸的是，这位妻子因前一次的教训，再不敢不与他“划清界限”，马上把丈夫装病的真相报告了领导。于是丈夫又遭到批判，气得要去杀了她。在这种情况下，就由组织出面，押着她丈夫跟她办了离婚手续。

我母亲听说，过了多年，那位丈夫得到“改正”了，儿女也大了，都劝父母复婚，但是当父亲的心上的伤口太深，坚决不同意。这个家庭就这样永远破裂了。

谁能想到，那照片上满面喜悦的“下放干部”心中，还藏着这些苦涩的故事……

一个“右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的经历

杨宝智

作者简介：杨宝智教授，1935年生于广东佛山，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1957年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到重庆市歌舞剧团“监督改造”，后任首席小提琴演奏员、乐队指挥。文革中饱受磨难，曾为普及“样板戏”废寝忘食作出贡献，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到四川大规模武斗“武装支泸”前线演出，在枪林弹雨中热情创作讴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烈士”的节目。后因闲聊中一句戏言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改革开放年代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在小提琴演奏、教学、作曲、弦乐艺术史诸方面均有不凡造诣。1996年退休后定居于香港。

从“右派”改造成为“摘帽右派”

1952年我告别香港，在广州经马思聪院长面试，考上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57年毕业前夕，因思想活跃，反对特权，主张民主选举，触犯了天条，被划为大学生“右派分子”，打入另册。眼看分配没有着落，惶惶之时，天降贵人也——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团长马惠文收留了我，使我免去到夹边沟、北大荒之类农场劳改的遭遇，而去了西南的山城重庆，在该团乐队任职，成为“本单位群众监督下边工作、边劳动、边改造的右派”。

不久，马惠文调四川音乐学院，该团与重庆市歌舞团合并，成为重庆市歌舞剧团。我除了经常被派下农村劳动之外，在单位里，我在厨房帮过厨、在山城的陡坡上拉过板板车……经过四年艰苦“改造”，脱了几层皮，由于态度老实、劳动表现好，终于在 1961 年 11 月，“摘掉右派帽子”，领导宣布我“回到人民队伍中”。不论本人还是亲友们高兴了好一阵子。

但好景不长，1962 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我又很快沦为二等公民，被称“摘帽右派”，“控制使用”：忽而被指定作乐队指挥，排练为歌剧伴奏的乐曲，忽而被指认为“要夺印的阶级敌人”而撤职；有时在监管下从事农业劳动好几个月，忽而又可作为“犯过错误的干部”，加入“四清工作队”，在重庆南温泉附近一个叫做公平人民公社的农村乡下，放手让我独自发动下面一个生产队的农民，去斗争所谓“四不清干部”，尝到了“扎根串联闹革命”的味道。

为造反派演出“样板戏”废寝忘食

1966 年夏季，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推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刹时，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烽烟四起，各地群众纷纷响应领袖“反修防修”的号召，“造反派”们揭竿而起，“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一阵子好不热闹。

重庆市歌舞剧团当然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这里，先花点笔墨，介绍我们团里最先起来的几位造反派人物。

先说外号“元头”的刘元才，此公是 1960 年从大学一年级招到歌剧团来当学员，学吹唢呐的，这批学员称为“四班”，以区别于 1957、1958、1959 年招的大班、二班、三班。他当时身体很好，练完唢呐之余，还常在大坝子练举重，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可惜后来他英年早逝，是我们乐队寿命最短的，而且一个儿子和女儿也都跟着他去了九泉）。1966 年国庆时，他与其他四人成立了“十一战斗队”，是重庆歌舞剧团首先竖起“造反”大旗的五个人之一（另外四人是李天鑫、胡光斗、周京鼎、陈运涛）。那时，各级干部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群众厉行镇压，气氛尚为严峻，他们偷偷搭火车上了北京，不久拍电报回来说“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但歌舞队领导陈岚却说他们是“偷儿、懒儿、烂儿”的集合。不过，等他们返回重庆时，南下来串连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学生已经来了很多，“歌舞剧团必须大乱”等大字报已经贴出，他们腰杆也硬多了。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慢慢成为我团造反派的主力。

再说善于唱歌、写歌、编剧的李天鑫。1967 至 1968 年间，他成了重庆全文艺界反到底派的“延安兵团”司令，当时叫“一号勤务员”，是“勤务员”中职位最高的。后来又当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以后他在成都四川省川剧院搞创作，2005 年我们在成都见面时，他已经退休了，仍在忙于电视剧的编剧和作曲。

另一个是拉二胡的胡光斗。他是团里反到底派“延安公社”的“一号勤务员”，在完成“斗、批、改”（实为“斗、批、走”）后的 1970 至 1972 年间，作为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被定为“三结合”的市歌舞剧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10个月，也被派往巴县接龙区小观公社和我等“二牛鬼”一起劳动，美其名曰“领导”，实则挨整。进入新世纪后，他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2012年夏天，与对立面一派815派的群众组织代表、也是当时的歌舞剧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温福泽，几乎同时去世，这算巧合吧？

还有一位是男声小合唱演员周京鼎。外号“皮筋”，80年代后，入了党，被市文化局派到这个剧场那个剧团去当支部书记，此是后话。

群众造反到了1967年初，由于伟大领袖的左膀右臂“皇后娘娘”江青和“储君”林彪对文革的前途和做法产生分歧，以致各地造反派根据对“一月夺权”的不同意见和倚仗不同的后台，分裂成两大派，如广东的“东风派”和“红旗派”；安徽的“好派”和“屁派”；四川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和四川大学“8·26”等。重庆则有以重庆大学“8·15战斗团”为首的“8·15派”和包括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等组织的“反到底派”。两派各自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对方则是“代表国民党”、“复辟资本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反革命”。尽管中央文件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毛夫人江青却又信誓旦旦说她赞成造反派“文攻武卫”。这样，全国各地两大派双方从“打语录口水仗”，到动手打架，到用砖头、钢钎……厮杀得不亦乐乎。而在兵工厂林立的山城重庆，则在1967年夏天开始用自动步枪，最后发展到高射机枪、坦克、登陆艇……流血事件层出不穷，骇人听闻。

1967年春，正当重庆市两派开始分裂，全市陷入无政府状态之际，经过参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弄得脱离文艺工作近一年，因而手痒、嗓子痒的重庆歌舞剧团乐队和重庆京剧团中偏向反到底派观点的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准备演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这是“上面”规定可以演出的戏，其他的文艺形式包括音乐、戏剧、舞蹈、戏曲、电影通通都被冠以“封、资、修”之名而被“一刀切”查禁了，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由于找不到乐队总谱，无法演出（此总谱在公开出版前，属于“国家机密”，一般人不能见到）。

此时，我团乐队弹三弦和琵琶的年轻乐员、后来成为《沙家浜》演出队一号勤务员的陈朵找到我，请我通过记录中央样板团演出的录音带（80年代后这一作法被称为“扒带子”），根据重庆当时的现实——能参加这个演出队的人所组成的乐队的编制，写出总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表现自己“真革命”的机会，所以就答应下来。这样写出一场排一场，夜以继日两个月，终于得以成功演出。此后，我一直在《沙家浜》演出队里拉小提琴。

陈朵是继我团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十一战斗队”之后起来“造反”的，1967年“二月镇反”后，他成立了“血战纵队”，这个“纵队”最初只有两个人。1967年夏天，他见我废寝忘食战高温、不计一切地“革命”，精神感人，堪当劳动模范，希望我加入“血战纵队”。鉴于当时上海《文汇报》曾登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回答群众疑问时说过“‘摘帽右派’要加入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通过严格考验”的话，所以不少人劝他不能要我，但此君力排众议，毅然吸收我为“血战纵队”成员。从此和他战斗在一起，建立起革命友谊至今。

我们《沙家浜》演出队在 1967 年 8 月 1 日演出完《长征组歌》之后，因重庆已经爆发真枪实弹的武斗，我们跑到成都去躲避。这段时间，我和陈朵也随到成都躲武斗的重庆“财贸 9·21 宣传队”到过大小凉山，前后近一个月。

我被造反派组织“劝退”

后来，《沙家浜》演出队又想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于是，1967 年年底，通过重庆“工总司”与上海“工总司”联系，我和其他几人一起被派往上海交响乐团抄《智取威虎山》总谱。抄完后，我绕道回广州老家一趟，拜见了父母。

1968 年 1 月 2 日，我从广州坐火车回到重庆。刚刚进到歌舞剧团大门，在大坝子上赫然见到醒目处有一张写我的大字报，大标题是“把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杨宝智揪出来，清除出延安公社”，说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要把我“从革命群众组织中清除出去”！落款是我们乐队的小罗。

真是五雷轰顶！

这位小罗，在 1959 至 1961 年间我右派未摘帽时，就是对我实行监管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每周要向他“汇报思想”一次，接受他的监督训话。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歌舞剧团的乐队分为两个小组，他是我这个组的政治组长（此外尚有业务组长、生活组长）。《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6 月 8 日乐队队长老孟组织写的、按批判“三家村”的调子系统批判我的长篇大字报中作者落款签名就有他。这份重磅大字报贴满排练场的墙壁，出笼当晚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失眠（第一次失眠是 1957 年 9 月 3 日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要召开批判我的大会的头天晚上），预感将要掉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异常恐怖（据参与此事的、后来移居新加坡的顾老大回忆说，此事小罗表现得最左）。在那些“矛头指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最严重的时期，我没有一天不受到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大批判”。不仅如此，还要隔三岔五向他“汇报思想”，出入大门也要向他请假。造反派起来后，他是全团有名的“保皇派”，号称“铁杆老保”。但 1966 年 11 月后受到北京来串联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小陈的影响，思想逐渐转变，没有监管我了，我似乎逐渐自由了，可以自己上街到处看大字报而不必请假了。1967 年 1 月初，我请探亲假回广州。2 月份回到重庆得知，“二月镇反”之后，他变成造反派了。造反派分裂后，他加入了我团具有反到底派观点的“410 部队”。我到上海抄谱前后，我团反到底派观点的包括“410 部队”“血战纵队”等四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成“延安公社”。原“十一战斗队”的老造反派胡光斗、“元头”自然是一、二号勤务员。

小罗的大字报出来后，他们跟我说，经过勤务组认真研究，认为我表现是好的，不同意小罗的大字报提出的“清除”的说法，但是为免“延安公社”被对立面（8·15 派）攻击为网罗牛鬼蛇神，勤务组作出“劝退”的决定，劝我为了“大局”，最好自动退出组织，但是还要“继续革命，组织上脱离了，思想上不脱离”云云。

话说这位小罗同志，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政的年代，又被作为清查运动的对象，在团里关起来隔离审查一年多，深深体会了“被专政”原来是这般味道。在我的“右派”身份被“改正”后，我们才建立了平等、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互相帮了些忙。特别是 1980 年

某日，我在江北指挥一个民族乐队伴奏的歌剧结束后，小罗让我坐他的摩托车先于全团演职人员的大客车提前回到大院，才发现前妻和我一位徒儿之间的隐情，从而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家庭生活。小罗退休后在重庆郊区铁山坪建了一栋四层楼有电梯的别墅，还请我去住了几天。此是后话。

奉派参加造反军宣传队

转眼到了 1968 年 4 月初，我正在歌舞剧团一间琴房的钢琴上，埋头练习刚收到的中央乐团老同学、57 难友洪威廉寄来的殷承宗编写的油印《钢琴伴唱〈红灯记〉》片段乐谱，歌舞剧团的反到底派“延安公社”勤务员、我团乐队唢呐吹奏员刘元才（外号“元头”），急冲冲带了一个穿工人劳保服、脸上有几颗麻子的人来找我。刘元才严肃地说：“杨宝智同志（我这个‘二等牛鬼蛇神’，多年没听到有人叫我‘同志’了，听他这样称呼，我特别高兴），五一节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将要成立（注：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于 1968 年 4 月 28 日成立），造反军宣传队准备代表重庆反到底派去参加庆祝大会，但缺少一个能奏多种乐器又能搞点音乐创作的人，经我们勤务组研究，认为你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现在派你代表延安公社参加他们宣传队，也可能去宜宾不久后还要去成都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全程大概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你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下个星期就开始排练。这位是宣传队队长，一号勤务员涂安杰，具体任务由他和你联系。”

且说当时，我听“元头”那番话后，就立刻表了态：“我本人倒没意见，但会不会又被小罗之类的人说成‘坏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以后秋后算账，又拿出来批判，我怎么办？肯定完了！”

“元头”说：“右派摘了帽就是群众了嘛，通过这一年来的表现，证明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勇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织上相信你，你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被他戴了高帽子，欣然答应，参加了“造反军宣传队”。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多如牛毛，每个系统的对立两派，都有各自的“宣传队”。一般来说，宣传队的演出形式包括独唱、重唱、小合唱、舞蹈、快板、对口词、相声、评书、器乐演奏……内容无非是我们这派怎么受压，怎么“想念毛主席”，怎么“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也有宣传“最新最高指示”，“中央文革最新指示”等等的内容。我在那里无非是表演一个小提琴独奏节目，演奏一些根据当时的“革命样板戏”诸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音乐片段自己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或是根据流行民歌《远飞的大雁》自己发展的独奏曲等等。当时中国的西南部，在 1967 年 2 月曾因对夺权不同意见而被军方打成“反革命”（时称“二月镇反”）的造反派，如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西师“8·31”、“工人造反军”等，用西藏民歌《远飞的大雁》填上如何“想念毛主席”的词，作为“派歌”，从而广为流传。这个曲调很适合于反映“受压”的人群盼望解放的心理状态，1967 年春夏之交我在重庆市的大礼堂为三四千人演奏《远飞的大雁》时，就听到台下传来呜咽哭啼声。很多人都在“二月镇反”中被作为“革命对象”“专政”过，希望毛主席会像神仙菩萨一样，把大家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那个年代，我的小提琴独奏，是名副其实的“独”奏，真正无伴奏，因此适合于任何场合演奏。但是，从1957年打成“右派”后十年来就未曾上台独奏过一次的我，在大小凉山地区多次为“翻身农奴红色造反总团”（简称“翻奴红总”）的彝族同胞以及支持他们的“支左”部队演奏，领略到“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滋味，不能不说这是人生之一大快事。

两派的宣传队都争说自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各自的“毛泽东思想”内容却不大一样。尽管如此，一大帮青年文艺爱好者可以在这些宣传队中一展身手，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创作欲。再者，尽管不同番号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支持不同的派别（都说是“支左”即“支持左派”），但是，任何为宣传队“慰问支左部队”演出之后准备的那顿丰盛的饭菜，绝不是在那个物资供应贫乏的岁月街上可以随便吃得到的。所以，“吃支左饭”对于参加宣传队的队员来说，也是非凡的享受。此外，宣传队还是为各路文艺青年找对象、谈恋爱创造机会的绝好地方。

决心到“突破口”去“接受革命的考验”

这次“元头”叫我加入的这个宣传队，全名叫做“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第一宣传队”，队旗上还有“狂飙轻骑”四个字，太繁琐了，故而简称“造反军宣传队”。

由于我们市歌舞剧团地处重庆繁华闹市区的中心，解放碑旁边的八一路（文革前叫保安路），交通方便，又有排练场。而宣传队员是由各个不同系统、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人自愿组成的，所以造反军宣传队决定就在市歌舞剧团集中开会、排练。

第一次大家见面的时候，队长（又称“一号勤务员”）涂安杰对我说，他也是文化局系统的，不过是局下属的电影机械厂的模型工（工人的身份在当时是最光荣的），很喜欢跳舞。然后他分别向我介绍他们的成员：这是你们歌剧团乐队打打击乐的“小甲甲”的哥哥“大甲甲”，是“二号勤务员”；这位叫弋贤才，这位小伙子叫“幺妹”，这个女娃子叫三毛，后面是大双、小双、大艾、小艾、王抱焉、甜荔枝……这些都是跳舞的；这边是担任女声独唱的小眼镜，乐队打扬琴的长春，拉板胡二胡的钟锋，拉手风琴的小张……介绍完了，他说：“现在请造反军总部的宣传部长唐工同志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唐工看起来很成熟，但是后来知道那时才刚刚二十出头，文革前是市大坪中学的体育教师。四十年后，我见到的唐工已是满头白发，在以“祖传医术”开医馆。他告诉我，他原名唐湘捷，他爸爸在四十年代是一名抗日川军军人，因他出生时爸爸刚在湖南参加了对日本打的那场胜仗“湘北大捷”，故给他起名湘捷。

唐工对宣传队作的动员讲话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时候说了，解决宜宾问题，是解决整个四川问题的突破口，现在我们代表重庆反到底派去宜宾……”

所谓“突破口”，就是说文革前几年，宜宾地区的几个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因为“坚持党的原则”，被“西南王”李井泉打击陷害，后来到中央告状，刚好“伟大领袖”想利用他们作为打倒刘少奇官僚集团一翼的李井泉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包括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成员）就接见了他们，并说：“解决宜宾问题，是解决整个四川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封刘、张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的副组长和成员，封王、郭为宜宾地区“地革筹”正、副组长，李良为宜宾“市革筹”组长。他们都是支持成都的“8·26派”和重庆“反到底派”的。宜宾是他们的老窝子。造反军宣传

队头一年到宜宾去演出过，宜宾方面约他们第二年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再去演出，故有此活动。

但当时“中央”要平衡各方势力，故建立四川“省革筹”班子时，除派原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为正组长之外，同时派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为第一副组长。梁兴初原是三十八军军长，和驻守重庆的五十四军都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中的劲旅，五十四军在重庆支持“8·15”派，梁兴初自然跟他们一样。这时候的形势是重庆的“市革筹”与成都的“省革筹”各支持一派，而宜宾、泸州（属于宜宾专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重庆和成都之间，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去宜宾，可能有危险，所以有些朋友劝我最好别去。但是我当时一度被小罗那张大字报整得憋了一口气，正想通过有危险的“考验”，来证明我“不是反革命而是真革命”。于是抱着“经大风雨，见大世面”的愿望，加入到这帮从来不认识的人群中“共同战斗”。出发之前，还有一个重庆市少年宫教小提琴和舞蹈的女老师，外号“陶三”，也说要“锻炼锻炼”，参加到宣传队来拉小提琴。她的丈夫是我们乐队喜欢搞业余创作和指挥、曾经一度和我关系很好的吹长笛的同事唐福生，所以我就介绍她去找“大甲甲”。

“汪司令”介绍“前线”形势

造反军宣传队于1968年4月17日从重庆乘火车往宜宾出发，19号到达接待我们的东风矿区。这个矿区位于宜宾地区的珙县巡场镇，是宜宾地区重要的产煤矿区。作为刘、张、王、郭的“贴心豆瓣”、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司令”汪文麟（外号“汪三”），就是出自这个矿区。到达当天，“汪司令”向我们介绍“当前斗争形势”，说：“宜宾问题不仅仅是宜宾问题，而且是整个四川和大西南的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宜宾，是毛主席亲自选定和亲自指挥打开的解决整个四川问题的‘突破口’，但是阶级敌人妄图堵住这个

‘突破口’，自从‘红十条’下达以来，李（井泉）廖（志高）死党又刮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挑动不明真相的受蒙蔽群众，搞武装翻案，北打永川、荣昌，南攻纳溪、合江，现在正向宜宾方向杀奔而来，妄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上头说了，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我们文攻武卫指挥部有许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正在阶级敌人给我们摆下的三百里战线上，为新生红色政权站岗。希望你们去给他们演出，鼓舞他们的斗志！”

我对宜宾地区的情况原来一点也不了解，心想，回去重庆会不会在“秋后算账”时说我“煽动武斗”呢？我就向“汪司令”问了这个问题。他严肃地说：“这是正义的战争，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问题，是资产阶级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阶级敌人已经向我们进攻很久了，怎么是你煽动的呢？”原来，这次叫做“第三次武装支泸”，去年已经有两次了。“汪司令”的队伍番号是“泸（州）、纳（溪）、合（江）前线指挥部98营”，后改为“东风民兵团”，代号“206”。他建议我们“到前线去看看，那里有很多感人的事迹”。

所谓“前线”，就是武斗前线。4月25日，我们宣传队换上东风矿区矿工的劳保服，出发到“南线”的后方基地、离“战线”约五十公里的上马场，边“看看”，边创作，边排练。

我们住的那个上马场属于泸州市纳溪县，场边有条秀丽的永宁河，蜿蜒的川滇公路穿场而过。我们这个“东风矿区宣传队”在去上马场时看到一队打着“416”旗号的当地中学生

在一个操场排练文艺节目，但没怎么注意。一天黄昏，一个戴眼镜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敲开我住旅馆的房门，怯生生对我说：“杨老师，您可以教我拉琴吗？”我当即答应了他，并在晚饭后，到楼下给他上了第一课。后来才知道此人叫江瑞成，参加了纳溪中学生红卫兵“416”造反队，喜欢拉小提琴。当时我是“混入群众组织”的“二牛鬼”，怎敢不老老实实与“红卫兵小将”交朋友呢？不过朋友一交，就是四十五年的情谊。此为后话。顺便说一句，1969年我在“学习班”内受审查期间，江瑞成曾冒着风险，从成都给我寄了不少我一时无法看到的中央文革、省革委会文件等（他想为我翻案，但在当时真是妄想）。

四川所谓“场”，北方叫“集”，广东叫“墟”，原是农民隔三岔五交换买卖农产品的地方。上马场本来很小，只有近百户人家。现在人一多，就会发生矛盾。大概大家都是“造反派的脾气”，稍有言语不合，两边就发生冲突，一天下午，前线武斗人员与“416”学生扭打，五大三粗的魁梧大汉暴打文弱学生，发生老鹰抓小鸡的一幕。我不顾自身势单力弱，在密集的拳脚雨点中冲进人丛，极力护卫弱小，破喉大喊：“不要打了，这些都是小娃娃呀！”当时我们宣传队却有不少人在旁观。新友江瑞成也卷在打斗中，幸好没有受伤。后来他对我说：“杨老师，您很善良！同学们都说您人品好！”

战火纷飞中的演出和我的“绝命书”

经过一周多的排练，我们4月27日返回宜宾市里，28日至5月1日为成立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庆祝大会及军分区等单位演出了几场。之后在东风矿区演出了几场。每天演出我均有小提琴独奏表演，基本上是两首：一首是根据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段改编的独奏曲；第二首是根据藏族民歌《远飞的大雁》改编的《想念毛主席》，如果观众要求再来一个加演，则演奏根据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改编的短小提琴曲。其余节目，我有时候“票”手风琴为独唱或舞蹈伴奏。

碰巧重庆反到底派各文艺团体联合组织的京剧《沙家浜》演出队也到宜宾演出，这个演出队从1967年4月成立起，我就是里面的老人，人缘不错。所以我在时间不冲突时也去“票”上一场。

熟人们都劝我不要介入这些专横的武斗，“危险！以后还说不清！”而且中央最近又有“4·27指示”，批评了反到底和川大8·26这一方。可是我们在上马场听“武卫战士”们讲了些“英雄事迹”和“好人好事”（收集来以备创作之需的素材），大受感动，一辈子很难得有这个“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好机遇，哪怕是遇到危险，生命牺牲了，也是“死得其所”。而且每天在小提琴独奏后还能享受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不愿意离去。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年初受到小罗的那张大字报的刺激。我在宜宾那段时间，老是想到小罗那张大字报。你不是说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吗？我在这里当个“左派”给你看看，以雪“右派”之耻！

当时在宜宾战火纷飞邮路不畅，我还写了一封信，托《沙家浜》演出队的朋友带到重庆寄给我在甘肃军垦兵团的弟弟杨宝明，信上说：

“如果三个月不见信来，就是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牺牲了。我已经用实际行动改正了1957年的错误。”

这就是后来传说我曾经写过“绝命书”的来由。

5月1日之后，到矿区附近几个处（如54处、55处等）演出了几场。其中有个靠近贵州赤水的劳改矿山叫芙蓉煤矿，我们去演出过，矿上医务室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专毕业生，其中有位年轻的女医护小周，只要她来东风矿区出差，就到宣传队来玩，像是我的“粉丝”。听说她的对象在上海，但我从她眼睛里似乎看到什么。不过我没有和她深谈，生怕暴露我是隐瞒身份的“坏人”。

我们歌舞剧团以前曾经演过一个阿塞拜疆的喜歌剧《货郎与小姐》，说的是贵族青年阿斯克尔为了抗拒包办婚姻，化妆平民到处卖布以找寻理想的对象的故事。我在相对自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也曾想通过“卖布”（演奏小提琴）找对象，效果却不理想，因为但凡对方对我有一点想法时，家长就要找人了解我的底，结果一问，是个“摘帽右派”，就禁止女儿和我来往，害得姑娘痛苦地远离而去，如是者不止一次，其中还包括有重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一位相当能干的勤务员。

5月10日，我们宣传队到了离上马场往前8公里左右的大洲驿。当时所谓“宜宾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泸（州）、纳（溪）、合（江）前线指挥部”就设在此。那时已经成为宜宾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良，到大洲驿代表刘、张、王、郭来看望大家之后，我们开始天天为驻守在漫长的战线上的各个山头的“战士”及当地各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群众进行宣传演出。我在这些演出中的最大收获，就是上台再也不紧张了。以前在学校，一上台就应激反应浑身发抖，现在天天上台独奏，有时候一天两场，习以为常了，上台再也没有因发抖影响艺术发挥了。这为我1979年在重庆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成功打下了心理上的基础。所以我除了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外，同时也是受益者呀！

顺便说一下，20世纪60年代我在重庆市区（无论私下还是公开）演出用的小提琴，是一部相当好的意大利琴，在G弦拉旋律时，我的腮帮子都在震动，我几十年都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把琴的主人叫曾振东，他原是志愿军复员军人，十分爱好小提琴，住在我们歌舞剧团背后、原称民国路（文革“破四旧”后改为五一路）与新华路之间的一条叫道观井的小巷里的老宅。他因在50年代初赴朝作战时负伤（心脏二尖瓣旁有弹片的碎片尚未完全取出）在家休养。琴的来历不详，但他很希望有人能拉出好琴声来。从1963年起，他通过我团一位同事找到我，我开始隔个一两个月到他家里过过瘾。文革“破四旧”时，我把极少部分能够来得及转移的珍贵乐谱（如当时在重庆绝无仅有的美国版的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古组曲》之类）放在他那里，得以保存下来。1967年，无政府状态之后，我们来往就比较多了，我当年4月在重庆大礼堂面对三四千观众演奏，就是借用的这把琴。后来在朋友家里聚会需要表演时，他也毫不吝惜地借给我用。（曾振东于1970年去世，时年仅36岁。）

到宜宾，意大利琴当然不能带来“汪司令”“给我找了一把矿里工会的普及琴，调整之后勉强可用。乡下嘛，琴差一点听众也无所谓，也有的时候借用陶三的琴。据说在东风矿区有一位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不知道记错了没有，好像名叫冯异）有把琴，当时我不敢去找他，怕万一说不清，以后不好交代。现在想起来，没和他结交蛮可惜。1983年左右，被打成

“胡风反革命集团”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北京第一次会面，原来“集团”中许多人彼此间都尚不认识。真是欲加之罪呀！

满腔热情投入“战地创作”

我在宣传队里的任务是“三边”：边演出、边创作、边排练。所以花了不少精力在创作上。以前写歌曲的机会不多，现在不止写歌曲，还要编点快板什么的，顶部队文工团创作员的活，“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真是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活学活用到了极至。

5月中旬，为“武装支泸”的民兵部队创作了《何志东组歌》。收集到的材料说：何志东是个志愿军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一次“阶级敌人”进攻的时候，为保护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前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使用的《人民日报》上宣传的“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的豪言壮语：“不要管我”！所以我写的时候还满有激情的。组歌由“小眼镜”领唱，众人合唱，台上台下相呼相应，一片感动震撼山岳。

下旬，到了一个经过对方多次冲锋仍然坚守不动的山头，叫金盘山。想起1951年广播里经常播送的朝鲜歌曲《我守卫在金刚山上》，就写了歌曲《我守卫在金盘山上》。我自己幻觉这是和“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文工团的工作意义一样崇高。谁会知道那时候所谓志愿军们竟然是在为斯大林想要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不冻军港而卖命呢？

6月份我还写了一首歌曲《学习张显尧烈士》。收集的材料中说：张显尧是矿区55处的“一号勤务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对同志十分关心爱护，对“受蒙蔽群众”作了大量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平常爱说：“这里危险，我来干！”最后为掩护同志而牺牲。但我觉得这首歌没有何志东组歌写得好听。

“金山坡一役”后，我写了个快板书。6月10日晚上，206团高机连（高射机枪连）开全连好人好事总结大会，我在那里收集材料，后来因为太晚了，没有回宣传队睡觉而睡在他们连部。半夜突然听说“有情况”，要调高机连到前面去。不料六班扛子弹箱的战士病倒了两个，我为了“锻炼自己”，并证明我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牺牲的左派”，就扛起子弹箱跟着部队出发了。

拂晓到达“战场”附近田坎的石板路上，听见几梭子机枪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的声音，我赶忙按照以前看过的小说写的趴倒在地上。后面的人问我：“是不是受伤了？我说：“没有，误会。”又爬起来跟着大家向前走。把子弹箱送到指定的高机连阵地后，我就被安排在隐蔽地方观战。由于有薄薄的晨雾，也没有“观”到什么，只知道互相间歇地对射了些时候。以后，又转移了两次“阵地”，我都是扛的子弹箱。此次“战斗”于早晨9时多结束。后来我写了个快板，名字叫《高机连好人好事多》。歌颂他们“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以及善于“作政治工作”瓦解“敌军”。这是“体验战地生活”的成果。

说起来好笑，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宣传队所宣传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就居然是：“对‘武装支泸’的态度，是考验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和“每个人都要在这场革命战争中经受考验”之类现代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东西，但这些提法在当年《宜宾日报》上天天可以看见。

我们的文艺宣传的口号大概有：“武装支泸好得很！”，“武装支泸亚克西！”（“亚克西”是新疆维族语言，意思是“好得很”，当年流行于红歌唱词中），“武装支泸大方向就是正确！”，“武装支泸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国民党，踏平麻联站！”，“不消灭麻匪不回家”，“誓向麻匪讨还血债！”等等。不可理喻吧？

现在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麻”，其来源是：文革初期，重庆市委为了动员官办红卫兵“保卫市委”，曾给保守派红卫兵发麻饼（面上有一层芝麻的冰糖心饼），故造反派就把保守派红卫兵称为“麻子兵”。后来造反派又分裂，较为激进的那派就把对立派称为“麻派”。对方泸州的群众组织“红联站”，就被称为“麻联站”。至于“匪”的说法，来自 20 世纪中，早期合作一起打军阀和打日本的国共两党在内战中互称为“匪”；国民党称共方为“共匪”，共产党称蒋介石为“蒋匪”，称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蒋匪帮”。文革中造反派分裂后沿用此称呼，互相指责对方“代表国民党”，从而互骂为“匪”。

为了“体验生活”，我还参加了武装泅渡的训练。1956 年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当军事体育部长的时候，学校团委派我在寒假去学射击，那时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海河都结冰了，自然没有办法进行武装泅渡的训练。到了 1968 年夏天，“东风民兵团”在永宁河进行武装泅渡训练，我自认为游泳还可以，自然想补这一课。宣传队领来四支七九式步枪，我领了一支，和其他三人一起参加到民兵训练中去。开始下水后，怕枪沾水，下意识地老把它背出水面上，于是又觉得枪出奇的重，游起来特别费劲，而且枪杆随着沉浮把后脑勺一下一下地打得很痛——这个感觉在几十年后的现在都记得。后来才找到斜着背、让它和人的身体一起沉浮的办法，浮起来时它的木质部分还有浮力，可以帮助我人体上浮，就不费傻劲了，枪杆也不打头了，游到终点还没有落后。但是“东风民兵团”有个叫孔凡培的矿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带病来参加武装泅渡，没能游过永宁河，而被河水吞没，“牺牲”了，领导上叫整理他生前“学雷锋”的优秀事迹材料，准备编节目上演。但我没编出来。

一次翻车事件，带来了宣传队人员思想情绪的大动荡。

我们自从到东风矿区后，“汪司令”派了一部泰托拉运输车给我们宣传队专用，配了一个专职司机，人称赵大汉，重庆南桐矿区人氏，对我们这些重庆来的人特别关照，让我们生活上过得很好。加以我们和参加“武装支泸”的民兵一样，不单吃饭不收粮票，而且顿顿有肉吃，在那个年代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重庆一个月一人才只有二十几斤粮票、半斤肉票），所以大家都生活得很快乐。但是有一天转移演出场地时，天刚下过雨，泥巴公路打滑，到一个急转弯时控制不住，卡车就翻到公路旁的稻田里面去了，连人带乐器道具全部倾倒散落在稻田里，坐的坐、卧的卧，一副狼狈像。幸好是水田，又有未割的稻草垫着，基本上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一位女生个别地方软组织挫伤。

但是此后，“回重庆保平安”的想法就在宣传队萌生并蔓延。而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已经在 5 月底成立，并没有得到要我们去成都演出的通知。于是，六月下旬，大队伍就回重庆休假了。

一句戏言埋隐患

从 1949 年起，中国就陷入不断的“运动”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遍及工业、农业、文化、政治、军事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不仅有政治运动、经济运动，而且还有思想运动。直到历时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部分被冤枉打成“地主”、“富农”、“三反分子”、“不法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包括在国民党时代政府机关或军、警、宪、特中任过职的“历史反革命”和 1950 年之后具有异端思想及言论、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干部”、“反动学术权威”、“反党集团成员”、“叛徒集团成员”、“变节者”等等“革命对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杀、关、管、斗、批……）的人，数以百万计：每次运动还会规定整人指标：1%、2%、3%、5%……所谓“一小撮”，加起来就是好几千万。而他们的子女，都一律被称为“出身不好”的人，受到各级官僚及各种政策的歧视，甚至他们的亲属、朋友，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株连。

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官员大部分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被打倒，上面所说的这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子女、亲属、亲戚朋友，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被打成“反动学生”、“反党集团”的，也加入到受压的人群中，他们多误认为毛主席一定会解放他们（在三千年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总以为“皇帝是好的，坏的只是各级贪官污吏”），因而许多人都参加到造反派中去。造反派分裂之后，这里面的许多人，再加上 1967 年初“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反动组织”的成员，自然而然地参加到周总理所谓比较激进的一派之中，起码同情和持有这一派的观点（不满意一部分人倚仗权势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现实）。“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成员中，就有不少是这类人。所谓“造反军牛鬼蛇神多”，其宣传队的成员也不例外。

1968 年夏天在东风矿区，有一次白天演出，晚饭后没事，造反军宣传队中几个“出身不好”的男队员和我在一起摆龙门阵（闲聊），谈到个人问题（婚恋大事）不好解决，当时女方特别是女方的家长，都很看重男方的出身、成份，若是成份“高”了（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的子女），女方家长就会坚决反对，好事就得告吹。而我，不但是“分子的子女”而且本人就是“摘帽右派”，更为困难。所以大家悲叹：我等人要办喜事，恐怕得到了 2 月 30 号了！——大家都知道，2 月平常只有 28 天，闰年也就 29 天，没有 30 号的。小伙子们开玩笑说：“干脆成立个 2·30 兵团算了”。那个时候是“大民主”时期，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立个“战斗队”、“战斗团”甚至“兵团”，无须登记，也不犯法，更没有什么“维稳办”来理麻你。说完了不成立也无人追究。

殊不知，就是茶余饭后这样一句戏言，导致我们两年多之后身陷牢狱之灾。

在“纳溪战役”的枪林弹雨中

第一期宣传队员回重庆之后，我因为怕见小罗又给我写大字报，就和涂安杰留在矿区“体验生活”，归“206 团部政宣组”照管。这个阶段，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辈子以来第一次和纯朴的工人阶级同吃同住一同生活，感觉到涂安杰人很忠厚老实，对我很诚恳。

7月初，李良到“东风民兵团”进行战斗动员，还作了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执行毛主席有关俘虏政策的报告。一连几晚，都有数十辆运送武装人员和武器的卡车经过上马场到“前方”。我心想，这肯定是形势报告中说的“解决四川问题的淮海战役”了。我要实践自己“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十条”的誓言，积极争取参加这次“战役”。

这时宣传队只剩我和涂安杰二人，汪文麟以“搜集第一手资料好编节目”为名，批准我们参加“纳溪战役”。出发之前，涂安杰从206团给我们二人每人领了一支七九步枪和十发子弹。因当时弹药不足，我们属于非战斗人员，不能多领。

此次“战役”于7月3号晚上开始行动，由李良坐小汽车来来回回亲自指挥。我们二人和医护大队（包括小周）随团部第一指挥所出发，原定拂晓4点钟各部要进入纳溪东面的“阵地”（朝阳观），完成包围圈，但因下小雨，天黑路滑，走的又是山路田坎，所以虽然急行军走了一夜，仍然未到达指定的目的地。

第二天（4号）拂晓，雨停了，全线总攻开始，其他各部已经接火打响，我部于上午8、9点钟到达朝阳观，发现并无“守敌”，就向一个叫七块田的地方前进。坏了！由于天亮了，我们完全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下。在向一个山头前进时，我方曾冲到离对方的工事二三百米左右，但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仰攻，越前进枪弹越密。后因对方的重火力实在太猛而不能前进。我们几乎被打散了，漫山遍野地各自为战，牺牲很大，有些班减员后只剩4、5个人。

我只跟着旗手朝着前方走。当时思想很简单，集中在“死得其所”四个字上。想着电影镜头上：旗手倒了，我接上去把旗子举起来继续前进，如果我再中弹，就“壮烈”了。在通过两个山包间的一个三四十米的开阔地时，我听见头上的“丝丝……”声，我想大概是炮弹来了，赶紧卧倒，刚刚挨到地下，炮弹在左前方几米爆炸了！幸好，只埋了一身泥，没有受伤。前面受伤的，抬他的人又受伤了，我就冲回去通知担架队。

这一天，双方在七块田这一处呈对峙状态。当晚在山坡上的红苕田里露宿。但是其他战线“兄弟部队”进展很快。5号早晨，我们发现对方全线撤退，并向三猫石方向突围逃窜。我随第一指挥所前进，到达山脚时，一位指挥员（好像是姓方的营长，也许是老王）身边无通讯员，就请我带了一个口信给位于右翼的高机连和炮连：“告诉他们我们上去了的几个连的位置，不要打到自己人头上。”半路上要通过一条河沟，有七八十米被“敌方”半山火力封锁的石板桥，我用大学时候百米冠军的速度跑过去，前后左右都是子弹飞，居然毫发无损。口信带到之后，在各个连队配合下，对方“红联站”的部队向桂圆的产地蓝田坝方向溃退。

整个“战役”于下午4时左右，以我方占领纳溪县城而结束。我的七九步枪和十发子弹都原数交还涂麻子，由他交上去。所以来在学习班中交代：虽然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作为军事体育部部长，曾经担任步枪射击教练，但在此次战斗中却并未射出一颗子弹，这都是真的。

不过这之后，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情绪，认为我这是通过枪林弹雨的生死关的考验，经得起从严审查的，以后谁再给我发难贴大字报，我就可以说：“老子改造好了，对得起毛主席！”

记得打扫战场时，我曾和别的战士一起检查对方尸体，抬起一具尸体的手时，听到似乎发出鼾声，先还以为这人未死，一怔，再反复多弄几次，都是一样的，才断定他真的死了。

伸手到他胸前的衣袋里摸出他的工作证一看，是泸州化工厂的老工人，共产党员，在随身的《毛主席语录》中写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心书。

我当时幼稚地想：“麻匪”不是面目狰狞的匪吗？怎么他们也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概也是“受蒙蔽”的吧，不过不敢说。四十多年后，才知道这就叫“教派武装冲突”。就像阿拉伯世界中互相打得不亦乐乎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都信一个真主，都视一本《可兰经》为圣经；我们当时武斗的两派也是奉毛泽东是“大救星”，都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圣经，不是“教派武装冲突”又是什么？

“纳溪战役”结束后的黄昏，遇到芙蓉煤矿医务室的小周姑娘，看到彼此都还活着，一双紧握对方的手久久不松，眼里饱含的温存可想而知，就差点现代时髦的热烈拥抱了。但是故事到此结束，此后再也没有遇见过她了。伊人可好？

为“造神运动”吹喇叭

不久，涂麻子回重庆领来第二批宣传队员，人全部换了。指导员是造反军总部组织部的，外号“哈尔滨”；报幕员是原来在重庆市话剧团的年轻演员，绰号“飞机”；代替“小眼镜”唱女声独唱的是男高音（民族唱法）大成；乐队只有两个人，一个吹笛子的彭同华，另有一个吹笙的叫王明，是桐君阁制药厂的业余文艺积极分子；跳舞的有重庆水厂的何锡报等四五人，女生“大眼镜”、Z等四五人。

不知道上面局势有什么变化，仗打得少了，我们宣传的内容好像也悄悄地改变了。几乎所有歌、舞节目都要重新创作，总的来说还是为造神运动吹喇叭抬轿子。

7月，中央文革公布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意图是篡改历史，说刘少奇赖以成名发家的安源煤矿的工运，原来不是刘少奇领导的，是毛的功劳。我也跟着写了表演歌舞《毛主席来到安源山》。

8月，我写了表演歌舞《毛主席送芒果给工宣队》。当时所谓工宣队，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8年7月28日，“伟大领袖”以召见“学生五大领袖”为开始，将全国造反派头头控制住（不久之后都以各种罪名投入牢房），而以“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管辖一切，用办“学习班”的办法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实行红色恐怖，参加者只许规规矩矩，没有人敢再乱说乱动。但是我“不知死之将至”，还为这个歌舞写了个很优美的曲调，节奏是三拍子的。20年后中央音乐学院三弦老师委托我为三弦写教材，我就把这个曲调用在一首教材乐曲《月琴叮咚》里面，这本三弦教材在21世纪还出版了。

此外，我还为毛泽东的三个“圣谕”（最新指示）谱写了语录歌，写了对口词《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等，那时没有法律，圣谕就是法律。

第二期造反军宣传队的活动范围在纳溪县城以及在长江边的泸县弥陀镇、佛荫镇等地附近。我们住的地方多半是当地的一些小学或是庙堂的楼上，由“战士”们打扫干净给我们住，男宿舍和女宿舍中间拉一条布帘子，楼下的空地则便于排练节目。

有一天上午，男生在底下排舞，女生大部分出去逛街，我有点感冒，不舒服，睡在床上。布帘子的另一方有女生说：“杨老师，你小心，有人说我们宣传队里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好像矛头是指向你的哟！”我拉开布帘子，一看是 Z，她是 1964 年到川北平昌县凤凰乡的知识青年，最近经常听我练琴听得入神（那时我在改编一些“红歌”，如电影《农奴》的插曲等）。看来这时“卖布”有点成绩了。

那时候已经是夏天，大家热得没处躲的时候，会游一点点泳的宣传队员，都爱到堰塘游泳，不过那时大家都很“封建”，女生都是穿长袖长裤的演出服去游的。有两次 Z 邀请我和她一起去，理由是某男士有对她图谋不轨的倾向，而我则是她所信任的，可以在近距离起保护她的作用。在她换衣服时，还请我背对她为她站岗。因为那时我行动上表现得十分道貌岸然——其实我是“有那个贼心、没有那个贼胆”的。

9 月，全国除台湾外，各省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全国两派进行“大联合”、“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的大趋势中，我们于 9 月 21 日离开东风矿区。

我与汪司令汪文麟五个月来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此时依依惜别，并赠诗《七律》一首给他，开头两句是：“永宁河畔烟已散，歌乐山顶雾正浓……”。寓意宜宾的仗虽然打完了，重庆的局势尚不明朗，我回重庆前途未卜。他豪爽地说：“回重庆遇到什么问题你就推到我身上就行啦！”

9 月 22 日晚为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学习班演出。演出前曾经到宜宾地区文工团借小提琴，第一次他们不借给我，因为我们穿的是东风矿区的矿工衣服，半年来的战地生活，显得又黑又脏，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后来大概是里面有什么人看了我们彩排，回去说了什么，不久就有人自动拿几把琴来，很客气地让我选，问我想借哪一把。我挑了一把最好的来演出，并且结识了一些同行。

演出后离开宜宾，25 日回到重庆。国庆前后在大众游艺园及重庆体育馆为一些单位成立革委会演出，10 月 7 日在为造反军的“平山倒旗大会”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宣传队宣布解散。

此时全国“教派武装冲突”也基本结束。后来知道，三年之后，“汪司令”也跟“蒯司令”（当年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之一，北京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等全国各地的派头头一样被投入牢房。1985 年我借调到中央音乐学院时，还收到他从牢里写出来辗转送到我手上的信。1988 年寒假，他已经出来，还到重庆市歌剧团里面找我，刚好我回重庆评职称时遇上了，他给我留下了成都××街汪洋沙发厂的地址。可惜后来我到成都工作时按地址找他，该厂已经搬走。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愿他平安无事，不要像“蒯司令”那样只能坐轮椅才好。（近年我在深圳和蒯大富巧遇，跟其他朋友一起饮过几次茶，开头几年他很精神，很健谈，最后因为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以致中风，住到疗养院去了。）

关进学习班写交代

1968 年 10 月，实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到半数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全会公报》宣布，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被作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打倒，永远开除党籍，永世不能翻身。

冬天，重庆市革委从制作坦克的兵工厂——对外称为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抽调“工宣队”进驻重庆市歌舞剧团。工宣队的政委由我团马路对面的成都军区转运站的徐某担任。由于他对人太凶狠，说我团“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有一次他过马路到我团上班时，刮起一股阴风把他的嘴巴吹歪了，所以大家背地里叫他“徐歪嘴”。没过两年、死于癌症。

附带说说，每个单位进驻工宣队时，都要行一个仪式：找一队“根红苗正”的人，每人捧着圣物——人造芒果的复制品，在《东方红》乐声中，缓步从观众席走上主席台。当时四川除了我这样的“老广（东）”外没有人见过芒果为何物，都模仿报纸上的照片用蜡做成西瓜大的模型，我想笑又不敢笑。

很巧，驻我团的工宣队正队长姓傅，副队长姓郑，人们分不清：到底称为“郑副队长”好，还是“傅正队长”好？

工宣队进驻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等30余位“历史上有问题”的、但又称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人（区别于当时还未摘掉“五类分子”帽子的正牌“牛鬼蛇神”，称为“二等牛鬼蛇神”，简称“二牛鬼”），被关到重庆人民剧场写交代材料。

我除了写十七年来如何为“文艺黑线”服务、当右派如何“反党”外，要我着重写团里面的人们看不见的、如何参加“武装支泸”的材料。我当时自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功，如实书写，写完之后，工宣队还要我找证人，我就写：“以上证明人：宜宾珙县东风矿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司令汪文麟；重庆大坪电影机械厂模型工涂安杰。老实交代完毕”，一点也不担心。

大家终日关在剧场学习班里，每天除了要学习讨论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交代历史之外，不外乎是绣“忠字幡”（类似苏联电影中1905年“一九事件”东正教徒们游行时举着的长幡，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绣的是天主圣母的圣像，我们绣的是毛泽东像），跳“忠字舞”。此外每日例行早请示、晚汇报，这令我想起小时候一早一晚要祷告，当然不敢说出来。

1969年4月，与中共“八大”相隔十三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九大”把林彪副主席作为法定接班人写进新党章。“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随着已经“完成造反任务”的红卫兵们被“伟大领袖”逼迫“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利用价值已尽的一大批文革初期曾经走红的、被中央文革支持过的“造反干部”（如山东的革委会主任王效禹、贵州的革委会主任李再含等）的命运，也逐渐走下坡路。四川省革委会的刘、张，自然在所难免。不久，就传达中央指示：他们“犯错误”了。

话说1969年4月“九大”前后，驻重庆市文化局的军代表靳参谋长，把全市文艺单位（当时所谓“八团三馆”）各自的学习班统一关到当时已经停课的重庆煤矿工业学校（简称“煤校”）举办，按照军队的编制，分为许多个大队（每个剧团为一个大队，歌舞剧团叫41大队），每个大队设立若干班。每个班十余人，正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表面上正班长由工宣队员担任，而副班长由领导指定两派各一人担任，事实上大权掌握在军人手中。在煤校学习班中，

不但开展大批判，重新“清理阶级队伍”。不但“二牛鬼”要重新受到审查，两派“革命群众”也要互相算账，想法把对立面的群众打成“反革命”。

虽然在学习班里面很恐怖，但是每个星期六可以放假，有车接大家回团回家，这 24 小时是自由的。由于自从 1967 年在大礼堂表演小提琴独奏之后，两年来流传不少关于我的传奇故事，所以我在每个星期放假的时候，常常会被各个阶层的文艺爱好者们请去聚会，放松放松。每次聚会少不了要我表演一下，因而接触到了社会三教九流的人物。这点是文革前关在单位里不可能做到的。过了星期天，又有专车把大家运回煤校，继续搞运动。

我过了“清队”关

刘、张倒台后，“武装支沪”就不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他们“支一派打一派”、“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了。我自然也要重新被审查在“武装支沪”中的“罪行”。我猜想大概是参加过造反军宣传队的某人告诉了歌舞剧团中人，说我曾在“武装支沪前线”拿过枪，剧团中人就向工宣队反映了。这一下还得了，“阶级敌人还拿枪！”工宣队中 8·15 派的郑副队长直接气势汹汹地问我：“你究竟杀害我多少阶级兄弟？”非要把我整倒送公安局不可。

当时我在学习班 41 大队 9 班，分属两派的副班长一个是陈朵，一个是老黄。陈朵上面已经介绍过，这个老黄本来不但是我的广东同乡，而且是跟我同一届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分到重庆歌舞剧团的同学，但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另一派，所以总是带着有色眼镜，认为我是“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趁机翻案”，非要把我重新打成什么“分子”而后快。还未到煤校时，我就亲眼看见他怀着“无产阶级义愤”，向着我们这一派的团里面的同事，满腔仇恨、脸红筋胀地喊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口号，那个样子至今想起还十分震撼！

不久，就听说重庆话剧团已经有人自杀了。

我的事，作为一个乐队里的重点问题，自然要进行内查外调之后，才能作结论。要通过调查拿到我没有杀人的证明，就需要我提出能证明我没有杀人的名单，这样，我提出了涂安杰、李大成、“大甲甲”、“幺妹”、弋贤才、Z 等几个熟人。我相信他们不会乱说乱咬，用当时的重庆俗话叫做“兄弟伙一四六九扎起”。

按规定，“内查外调”当然必须两个人一起（而且原则上应是不同观点的一派一个），派谁呢？马指导员派了两个副班长：陈朵和老黄。当定下内查外调的日子之后，就通知我连续三个星期在煤校值班不能回城，以免我和调查那几个人串通。殊不知陈朵在内查外调之前，早已经冒着烈日跑遍全重庆，和被调查的几个宣传队的队员暗中分别通了气。结果老黄听到的尽是我在宜宾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何热心做好人好事之类的材料，觉得不可想象，怎么这“阶级敌人”这么好？

汇报上去之后，郑副队长也觉得很不理解：好容易捞到一条“大鲨鱼”，可以往上报“清理阶级队伍”成绩巨大，好立功邀赏，怎么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样，陈朵救了我一命。我过了“清队”关。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思想确实是很“进步”的，不像现在这么右倾：从1963年到1967年，毛泽东的“雄文四卷”，我就通读了两遍，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如“四篇哲学著作”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的段落都可以背下来，而且我当时确实是很真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的。这不是我自吹，我相信那些郑副队长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下半年，学习班搬到重庆大学。当时在41大队当工宣队领导的军人，已经由“徐歪嘴”换成较为温和的、另外部队派来的刘指导员。

有一天，刘指导员对陈朵说：“你们班的杨宝智，过去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犯错误，但是我们研究，杨是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想把他作为挽救犯错误的人员的典型，落实政策，你看怎么样？”这说明事情已经搁平。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大游行，我已跻身到能参加游行的革命群众队伍里了。

有一天，全体学习班学员出发到一个露天的阶梯型万人会场，听重庆市两派头头周家喻（省革委常委）、黄廉（市革委副主任）宣讲“消除派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现身说法。尽管他们按上级指示表演得很逼真，但，文革结束之后，他们都被抓进去坐了十几年的牢。

在重庆大学学习班，除了继续“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外。还要“解放干部”。这样，陈朵主持把1967年初搞“秋后算账”时被打倒的、以及被非党群众“开除党籍”的孟少卿解放回来当乐队的领导。此后，当官的还是当官，搬砖的还是搬砖，成为众所周知的社会现实。按下不表。

乱世中的“闪婚”

从宜宾回重庆之后，由于Z家里离我们歌舞剧团很近，我和她经常（一有可能就）见面，开始有点像“要朋友”（谈恋爱）了，但是她家里听到风声，不同意我们好，甚至她本人也没有勇气嫁给我——运动太恐怖，对她来说压力太大。后来一个寒夜在长江边上对我抱头痛哭一番后，她回平昌县去了。不久，她来信表示，结婚基本上不可能。

1970年，重庆大学学习班解散。工宣队全部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回歌舞剧团后，领导我团的军代表改为张副政委外加对门军区转运站的马指导员。我作为“二牛鬼”，被分配在团里的工作，先是为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作芭蕾鞋，然后为《交响音乐沙家浜》抄谱。最后，由于钢琴已经多年失修，影响样板戏的排练工作，我就调去专门修钢琴和调音。自己单人独立工作，当然比跟大家一起钉芭蕾鞋、抄谱，来得自由自在。

下班之后自然在外面交友。时不时还在一些曾经是造反军宣传队和财贸9·21宣传队队员们的家里演奏，听众自然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之类。其中有一次，在钟锋家里，他的舅舅是抗战时从广东逃难来重庆的，后来一直在解放碑最著名的心西餐馆当厨师，知道我是广东人后，同我用广东话交谈，还教我怎样做猪排：“先用刀背把剔骨的肉剁绒，然后再撒面包糠……”

那天晚上我拉完自编的样板戏片段和“红歌”之后，有人提出：“你们文艺界老是批判封资修，到底哪些音乐是封资修？可不可以拉给我们听听，让我们批判批判？”我想了一想，依次介绍了封——《阳关三叠》，资——《三套车》，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首临

时能想起来的、而大家又可以接受的东西。众人好久都没有听这些久违了的乐曲，当然高兴得很。我还得装模作样地批判一番，大家只是哈哈一笑。

夏天，在一位手风琴爱好者张宁的家中认识了小谢，她父亲原是一个空军医院的院长，三反五反的时候“被自杀”，母亲为丈夫申诉，终于在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她本人结过一次婚，后来因故离了。她嫁给我的唯一条件是要一部钢琴。当年钢琴可是稀有物资，一般人不可能有。刚好在文革前夕，我从我们乐队的同事冯叔容手上，用180元买下了一部重庆乐器厂试造的、勉强可以弹得响的钢琴。

这样，我的“终身大事”就无需等到“2月30号”了，当年11月就和她结了婚，这个速度当时就算“闪婚”了。婚后适逢林彪“一号令”下来，我等“二牛鬼”全部要安排下放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说是第一年可拿100%工资，第二年就只能拿80%，第三年拿60%，第四年要自食其力。

12月初，重庆市文化局所属的“八团三馆”全体几百个“下放”人员乘着十几辆大卡车，在阴风惨惨的送别哭声中，向巴县接龙区小观公社出发。

突遭隔离审查

我被分配在一家离开公社还要背着行李走两小时石板路的农户（称为“住家户”）家中。公社干部向农民介绍我们时，一律称“下放干部”，未曾说我是“摘帽右派”。况且我们每个月要交粮票和伙食费给他们的，所以农民对我不错，很客气，比在团里面和以前各次下乡劳动时，相对要友好、平等得多，称呼我“杨同志”。所以我和住家户关系也很不错，生活倒还平静，干农活时也受到照顾，时刻嘱咐我量力而行，所以不算太艰苦。缺点是没带乐器下来，精神比较空虚。

过了三个星期，大概是相当于圣诞节前夕，突然来通知说叫我把所有东西收拾好，要到公社去，通知的人神色很严肃，而且派了同是“摘帽右派”的演员白乐安帮我拿一部分东西。我们边走边分析，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到了公社，我还不知趣地给正在排新年节目的下放干部演员队负责人李平去提点音乐上的建议，她轻蔑地对我摆一下手，示意我“靠边站！”连话都懒得对我说。

然后马上由歌舞剧团革委会派来的二人：不久前还找我教过他两个儿子小提琴的著名诗人梁上泉和舞台美术队搞灯光的工人、共产党员、号称“大灯泡”的万太华，将我押解上一辆货车，说：“从现在开始，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我问：“到底什么事？”他们说：“你自己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梁大诗人此时更加凝重如铁的脸。

这样，他们坐车头司机旁，我坐在货车箱的地板上，垫着自己打的背包。寒风吹，车颠簸，八小时后，才到了团里，然后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由老黄、万太华和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号称“老贫农”的王发顺对我24小时轮流监管，用老黄所住的房间，加了一张床，作为我的禁闭室。

老黄说：“你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队学习班都给你滑过去了，哼！”

我问：“什么问题？”

他们就甩出一句话：“你自己知道！”

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不断动员我“老实交代”。叫我每天写交代材料往上报。然后每隔两天，张副政委和马指导员就找我谈话，要我交代自己知道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最初我想到一定有人陷害我，是谁呢？我想可能是小谢的前夫，也是造反军的，歌舞剧团背后官井巷铁工厂的工人管大汉。材料交上去，张副政委打回来说，“不是！不老实。”我又想，是夏天在我之前正在追求小谢的一位也姓谢的青年陷害我。材料交上去，张副政委又照样打回来说：“不是！态度不端正。”这样，依次怀疑曾经和小谢好过的和平电影院的美工张眼镜、南岸塑料厂的老范，都被否认回来。张副政委说：“我们是苦口婆心地挽救你，你怎么脑子不开窍呢？痛痛快快！‘竹筒倒豆子’！剩的时间不多了。刚才你看到公安局的人来了吧？你再不好好交代就不是在这里呆了。”

有天老黄说：“看在老同学份上，带你看看布告启发启发。”这是一张公安局贴的破获一个“地下俱乐部”，犯人皆判死刑的布告。我看完之后，居然觉得和我毫无关系。我说：“启发不出来。”他很失望。

张副政委又反复动员我：“为你自己本人的前途、利益好好考虑”（他把“自己本人”四个字用重音）。我说：“党不是一贯教导我们要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斗私批修’吗？怎么你现在又要我考虑自己本人利益呢？”他瞪眼说：“你没资格‘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

天哪！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起有什么问题，终日茶饭不思，十分郁闷。老黄又说我：“不要装死狗，这样下去没有好下场，公安局的人刚才又来了，你还不争取主动？”

经不起他们几番恐吓，我觉得只有一死了之。但自杀也不容易，黄某他们二十四小时包括大小便都跟着。因为那时全团只有一个在第一排练场旁边的公共厕所，从关我的禁闭室到那里去要下三层楼、还经过大操场，他们考虑这个过程中我会接触群众，会请人通风报信，所以要跟着。

触电吗？六只眼睛看着。不可能。

这时，市歌舞剧团在演出样板戏舞剧《红色娘子军》，每天晚上老黄、万太华都要打灯光，于是由要参加唱合唱的“老贫农”王发顺把我带到后台，告诉大家，这是“要犯”，让群众监管。后台的所有人我都认得，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搭理我。1958至1961年我还没有“摘帽”的年代，还有几个人跟我说话，如今我坐在那里，人们在我前面走过来走过去，只当我是一根木桩，视而不见，最多拿眼角瞟我一眼。也是，人家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反革命呀？”

公厕耳语让我如释重负

但是百密难免一疏。1971年元旦的次日，我上厕所解大便，老黄虽然跟着，但没进去，只在离厕所十米外抽烟，准备等我出来再押回去。意想不到的是陈朵来蹲在我旁边的坑，轻轻地问我：“你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不？”

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硬说我知道，太痛苦了，我想死。”

“千万别！我打听到他们说你是一个‘地下俱乐部’的问题，有没有？”

“我哪里有这种事嘛。”

“如果没有，就坚决不要承认！”

我们的对话几乎是耳语，老黄在外面根本听不到。

我完全放下心了：这显然是一宗莫须有的冤案！

这个元旦假期真是过得太有意义了！陈朵又一次把我从死神旁边拉回来了。

自从公共厕所见过陈朵后，我情绪十分轻松，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回到老黄住处，看见他书架上摆得有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总谱，趁他到走廊抽烟时，我就翻来看，抓紧时间学学吴祖强和杜鸣心等老师的配器高招。“大胆！不好好交代问题还看我的总谱？上次叫你看公安局贴的布告那个问题考虑得怎么样啦？”他发现了冲过来吼道。

我心里有底了：“你说的是‘地下俱乐部’的事啊？”我用《智取威虎山》里栾平的腔调继续说：“有四十几处哇！”，“马上交代！”

我拿过他递来的笔和纸，把最近两年所有朋友聚会时拉过琴以及教过琴的场地，都一一写下来：

1、梁上泉家里。俱乐部主任：梁上泉。（他曾经请我去教他儿子学小提琴。）

2、重庆大学学习班九班教室。俱乐部主任：班长黄某。

3、《8·15风暴》首席小提琴、老黄的朋友焦亚虎家里。

……

他气愤得咬牙：“狗以（日）的！”（他虽然来了重庆十四年，但是讲四川话，哪怕是骂人的粗话，都还没有脱离广东话发音）拿去上交了。

我这天晚上是从被农村押回团以来第一回睡了个好觉。

原来是追查“230兵团”

第二天，张副政委传令找我去谈话：“你以为你在人家那里拉拉‘胡琴’（政委虽然见过大家排练，但没听说过何谓‘小提琴’），我们就把你弄回来审查吗？”

“我想是的。我想不出别的原因。”

“那个叫钟万玉、又叫钟锋的人，他的舅舅是什么人？”

“广东人”

“啪”的一声，张副政委大拍桌子，吓得我说话只能断断续续地：“心心……心心……心心的西餐厨师，猪排做得很好。”

“谁问你这个？你和他之间有什么反革命勾当？”

“没……没有。”

“不老实！……加温！”他跟马指导员说。

过两三天后的一个寒夜，乐队在练乐室开我的斗争会，旁边生了个火盆。不知为何，批判的都是“武装支泸”的事，唯独不提“地下俱乐部”。你一言我一语，包括“元头”，都属表态性质，表示跟我划清界限。唯独李懋绩轻描淡写好心地说了一句：“主要要从路线上看。”

第二天早晨，张副政委把我找去：“别的不多说，你跟我交代‘230兵团’的问题。交代清楚就放你走。”

我说：“搞了半天是这个事啊？那是我们在宜宾的时候几个宣传队员吃完饭开的玩笑。”

“玩笑？你们没有打算拉起一个兵团在重庆綦江和贵州之间的大山打游击？据说你还是兵团司令？”

我笑道：“你看像吗？”

他皱起眉头想了半天：“这件事情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先回去吧！”

我回去把当年的情况写了不到半张纸交上去了，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没有多的好写。幸好当年我的档案上光写不好的方面，没有写 1956 年中央音乐学院派我去学射击，回到学校又当射击教练的光荣事迹。如果有，“上山打游击”一事可能跑不掉了。

自此之后，监管气氛似乎松了些。王发顺来说：“你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一副优待俘虏的口气。我提出理发、洗澡等等，起码可以上街走走，呼吸一下别样的空气了。

除夕，团里给大家聚餐，普通人可以在食堂领几个菜，我只能领到一份炸带鱼，还算是特别恩赐。这份带鱼炸得很透，吃起来脆嘣嘣的，很开胃，吃完了还不够，还想吃，没有了。这时候，王发顺走来说：“过年了你需要家属给你带点什么吃的不？”我说：“炸带鱼。”过两天，我收到他转来的小谢送来的她堂哥哥做的带鱼（当然很感谢，但是略微有点遗憾，因为不是食堂那种脆的，而是红烧的）。有传闻说王发顺偷吃了一部分，我看不见得，他那些过节“打牙祭”的东西还未吃完。还有人杜撰说“带鱼里面藏了一张纸条”，把我“从精神崩溃想自杀的边缘挽救过来”了。且不说元月 2 日陈朵在公共厕所的谈话根本转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就说过年前禁闭室窗口吹的“祥风”也够使人神清气爽的了：

原来，关我的“禁闭室”（老黄的房间）旁边是我们乐队拉手风琴的“小甲甲”的寝室。过年前几天的一个上午，监管我的人都不在，“小甲甲”的哥哥、当年造反军宣传队的二号勤务员“大甲甲”，经过老黄的窗口，他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把情况讲了一下。他说：“拉板胡那个钟锋，不知道什么案子，被关进局子里，随便说什么都说他没交代彻底，他只有把‘2.30 兵团’的事编个故事出来说，这样，宣传队其他几个人都被理麻（注：川语，审查、收拾之意。）了一下，因为确实就是一句玩笑，查不下去。好像除了他，其他人都放出来了。”

这之后，我心里就更有谱了，再也想不到自杀了。自然也未曾想到九年之后的春节，居然还能在重庆人民剧场成功地开我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此为后话。

至于老黄，四十五年之后，在重庆江北一个住满了文艺界退休人员的“天邻风景”小区碰到他，当然，一笑泯恩仇，都付笑谈中，大家像没有事一样交流交流近二三十年的作品（得失、感想之类），谁也不去触动那“2.30 兵团”的事。

了犹未了

春节后，我到食堂打饭也无人紧跟了，只是远远地、走过场地被“监视”着。

有一天，陈朵找到适当的时机和我耳语：“最近要开个全团的批判会，这是他们给自己下台阶的动作，好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开头自以为抓到条‘大鲨鱼’，搞了半天又没‘搞到着’（达到目的），实际上就是结案了。你要有思想准备，随便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还嘴，事情就过去了。他们叫我上去发言，我拒绝了，本来搞错了嘛，莫须有的事情，说什么呢？”

有趣的是，开批判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乐队吹圆号的、四川音乐学院 1964 届毕业生，也是我们“血战纵队”成员的喻钟弘君，趁“看守”不在，走进关我的禁闭室说：“杨宝啊（亲近者都这样不称全名），刚刚接到通知，要我明天上台批判你，说你到处‘宣扬封、资、修，毒害青少年’。我不知道讲什么好，你是不是提供点材料，要不然我交不了差呀！”

我想了一下，于是乎就告诉他：“封建主义，你就说我拉过《阳关三叠》，词是根据唐朝的诗人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发展的，当然是抒发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的啦；资本主义，就说拉过《三套车》，旧俄时代的歌曲，列宁以前的当然是资本主义啦；修正主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够不够修？怎么样？”

他连忙说：“行了行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这就回去开个夜车写发言稿。”

第二天开大会由革委会主任李光亨主持。给了我张椅子在他面前坐，先定了调子说我是条“哈巴狗”（这个调不算低也不算高），然后叫我“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教育”。既然是为他们下台阶的“批判会”，大家都在念稿子、演戏，由于调子定得不是很高，喊的口号还算温和。只是我们乐队吹双簧管的小范突然冒出一句：“打倒杨宝智的反革命气焰！”比大家高了一个增四度，不大协调。所以，所有其他人当时喊的口号我都忘记了，唯独他的声音和表情现在印象还历历在目。

大会开完了，自然过两天就该回乡下了。返乡前开恩放一天假回家看看，就得赶到巴县接龙小观公社报到了。这次分到大同大队，住家户是另一家贫下中农。这次我带了个手风琴下去，农业劳动也表现得不错，干活时肯甩开膀子，还带了理发工具，给贫下中农们剃头，受到不少农民赞扬。不久，文化局的党委书记苏老太婆苏里下来看望大家。见到我时对我说：“杨宝智，你的事还没有完，你要继续老老实实接受大家监督。帽子掌握在人民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

乡下有不少趣事：例如法国留学生、我们老广、声乐专家、“特嫌分子”薛传懿从乡民那里拿到一条蛇身（他们把头砍了、胆吃掉了），我们两人弄熟了，还是吃得很愉快，苦中作乐嘛。

转眼就到端午节，突然又接到通知叫我收拾所有东西回单位报到！

这该不是又是什么案件吧？当时抓“5·16”正起劲，但是大家分析我不够格。好在没有谁谁谁来押我回去，而是行动自由——“自便”。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公社，住家户依依不舍地包了些粽子叫我带回去。回到家，众人曰：“除四旧”后，久违此端午节矣！

次日回单位，才知是革委会要抓“基本功训练”，钢琴又不准了，琴键也起不来了，要我修理和调音！原来如此。拿调音扳手当然是要比拿锄头轻些。

国庆前后，过去跟我学过小提琴的学生张子扬突然闪进家里来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跑了……”

我愕然，他补充道：“而且死了！”

听得我一时懵了。看见我没有反应过来，他讲了个大概，说文件目前只传达到省军级。

刚巧，收到江瑞成写来问我有关小提琴练习的信，他这时在宜宾军分区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我回信问他，他很快答复：确有其事。

不久，下放干部全体回城，次日在团部会议室集合。梁上泉的夫人蒲心玉对大家宣布：“现在大家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报告，杨宝智不能参加听，你的事没完！”

我说：“不外乎是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嘛！我早就知道了，不听也罢。”

众人大惊。他们在下面什么都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党章规定的林副主席还“永远健康”着哩！

随着林彪系统的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受审查，四川的梁兴初也跟着倒台。不久，张国华逝世。那首载歌载舞的《张梁刘张来四川》的“红歌”歌声还在耳边响着，四个人就没了。但是我的“2.30 兵团”一案，从苏老太婆和蒲心玉说“没完”至今，也没有谁给我说个“么二三”。真所谓“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如今，事隔几十年，回到香港闲来无事，把这些奇事写出来，供有心人茶余饭后消遣消遣，莞尔一笑吧。

不过现在看起来，不少那个年代的名词都要加一长串注解，否则现代人很难看懂。一般香港人是看不懂的啦。

2013 年 3 月

潘虹日记（一则）

编者按：这里辑载著名电影演员潘虹日记中的一篇，虽只有一天的日记，可让人们值得思索的东西太多太多。人，无论生或死，都必须享有他（或她）应有的尊严。潘虹说得好：“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大背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谓分清敌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兵团三杰都被迫害致死（1968 年 4 月 16 日，傅其芳含冤自尽；5 月 16 日，姜永宁含冤自尽；6 月 20 日，容国团含冤自尽，终年 30 岁）。

小背景：潘虹爸爸的一个耳朵被别人撕下来一大半，1968 年 4 月 19 日吃药自杀了。第二天，潘虹妈妈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潘虹妈妈只好委派小女孩潘虹去处理。

潘虹日记·无法哭泣（1994 年）4 月 21 日 星期四

26 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

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 26 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 26 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偷”一支钢笔，“判”十八年劳教

——记右派子弟、小劳教张正宏

谭 松

从 1958 年被押送劳教，到 1976 年被释放回渝，张正宏被“判”了十八年劳教，罪名是“偷”了一支钢笔。

2013 年 11 月 8 日，“大堡小劳教”幸存者之一张正宏先生因病在重庆去世，终年 67 岁。

当年在四川峨边沙坪劳改营的小劳教们纷纷前来为他们敬爱的难友送行，这群当年最小只有九岁的劳教人员，眼含热泪，秉烛燃香，一个个依次在灵柩前深深鞠躬……

躺在灵柩中的张正宏，与前来与他诀别的难友，是当年数千小劳教犯之一，也是那场劫难之后数百幸存者之一。

张正宏 1946 年 6 月 23 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张愈当年曾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1957 年，张愈在四川温江地区一所中学教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押送劳改队劳改。1962 年，张愈饿死在劳改队，当时没人通知他的家属。

但是，灾难，却一丝不苟地殃及到他的家属。

1958 年，12 岁的张正宏正读小学。一天，班上一位同学钢笔不见了，老师认定是张正宏偷了。张正宏不承认，老师张口骂道：“你一个右派狗崽子，不是你偷的是谁？！”张正宏一气之下同老师顶撞起来。

这种顶撞要付出什么代价，当年 12 岁的张正宏是读不懂的。（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文明可能也很难读懂。）

12 岁的少年儿童张正宏被学校送到公安派出所，关押了几天后，派出所说：“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吃饭的地方”是千里之外的川西小凉山，在那山高林密蛮荒之地，当局建有大大

小小的劳改和劳教营。

没有人告知他的母亲（后母）张正宏到哪去了。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已经是最底层的贱民，她若呼喊，不仅没人理睬，而且还可能惹火烧身。于是，一个鲜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少年儿童，就这样从社会主义学校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正宏被解押上路，12岁的他，完全不知道前面的岁月是什么，有多长。

“我到过不少劳改、劳教营地。”张正宏生前告诉笔者，“记得最大的是川西普格县的莽窝监狱农场，对外叫72号信箱。那里面关押了至少十万人，主要是解放大西南时抓的国民党兵等历史反革命。我在那儿给管教干部当小佣人，给他们背娃儿、拿信、拿报纸等等。”

后来，张正宏来到川西小凉山深处的一个右派劳改营，加入了一个由五千余名十余岁孩童组成的劳教大军。

峨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部小凉山地带，此处海拔近2000米，地广人稀。当年当局在这儿精心选了一个“口袋形”的“宝地”作为关押右派分子的劳改营。劳改营前是滔滔大渡河，后是莽莽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右派们被解押到此地，开始他们漫长而血腥的劳改之旅。

在这个被叫作“沙坪农场”的劳改营地里，有一个作业区叫大堡，如张正宏这样的少年劳教犯们被集中在这儿“脱胎换骨”。

少年劳教，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明创造。一如引进苏联劳改制度一样，中共当局也引进了少年劳教。到1958年，全国建了多少少年劳教营地我不得而知，大堡当年关押了多少少年劳教犯眼下也没有确切数字。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的右派，当年他被派到大堡担任了一个管理少年劳教的大组长，据他估算，当年那儿有五千多十余岁的小劳教。

这些哭叫着“妈妈，我要回家！”的少年儿童，在这荒寒之地，一头撞上了“新中国”的三年大饥荒！

死神，毫不手软地把这些十余岁的少年，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解押上路，终止了他们“要回家”、“要吃饭”的童声呼喊。

“死得多！一批接一批的死！几个山头都埋满了小劳教。”张正宏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林宪君告诉笔者，从1959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埋饿死的孩子，到1960年，小劳教们大批死亡，天天死，天天埋，一直埋到1961年底，他亲手就埋了100多个孩子。他还记得有一个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叫他把萧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在路上，孩子告诉他，他三岁就没有了父亲，母亲靠捡垃圾养他。他因为饥饿偷了农民的几块红苕，就被送来劳教。他说，他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这就是这个孩子在世上的最后几句话，他在林宪君的背上断了气。

同那些大批饿死的小劳教相比，张正宏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来自他聪明伶俐的头脑，眉清目秀的相貌和热心助人的侠义。在劳教地，张正宏手脚勤，嘴巴甜，他帮人买东西，为人

送书（口）信……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爱，他被送到四川德阳少管所读书两年，幸运地躲过了大批死人的 1960 年（注：因沙坪劳改农场死人太多，场长被判刑。），他也因此成为了 1961 年几百个幸存小劳教之一。

没饿死的张正宏后来一直在劳改农场干活，他心灵手巧，加上勤劳肯干，因此获得过不少劳改地的奖状，还被评为“学雷锋标兵”。

1976 年他回到重庆，由于家乡当局对他们这批小劳教的歧视，他们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和社会福利，他们只得四处去下苦力。张正宏又是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和勤劳肯干，在几年后当了个体老板，成为他们那批难友中经济上的佼佼者。

晚年的张正宏不仅常常在经济上帮助当年的难友，为他们争取社保养老上下奔波，而且积极协助拍摄关于小劳教的记录片，为废除万恶的劳教制度尽了自己最后的贡献。

《巴山夜雨》编辑部后记：《巴山夜雨》是电子民刊，为满足本地一些没有或不会电脑的老年读者，印了少量的纸质文本，虽是少量，也有许多具体事务得有义工朋友来作。2010 年创刊后的前两年，热心的张正宏先生，隐瞒自己身患重病，自愿做义工，多次义务背负运送印好的刊物。在他去世后的第一时间里，《巴》刊编辑部成员，代表《巴》刊和广大读者前往吊唁敬献花圈，深切悼念这位正直，善良，急公好义的朋友，张正宏先生，您一路走好！您所深受其害的万恶的，非法的，极其没有人性的劳教制度，终于在您去世后不久，在时代进步潮的冲击下，宣告废除。

逸 闻

佚 名

近日偶然在网上发现一位旧识去世的消息，感慨点点，信笔写来。喜欢搞中英诗词翻译的朋友们也许碰到过她的名字——王知还。

说是旧识，实际上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相识的原因，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知道了她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为她的遭遇感到人生的不平，也为当权者的“煮豆燃豆箕”和“狡兔死、走狗烹”的行为感到愤慨。

见到王知还是 1980 年代中期，那时她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老太太了。因她当时是安庆师院的英语老师，我们就称她为王老师。

王老师是一位外交部老朋友介绍来找我先生的。我先生当时在国务院某机关工作，王老太太来北京告状要求平反，需要把状子递到最高一级管事的人手上，就由她的老同事和朋友介绍过来（据说几经辗转，期间有陈白尘、匡亚明、楚图南等知名人物）。其实他们也是有病乱求医，我先生这样一个小萝卜头哪里能有通天的本事？

很快我们就知道，王老太太本人就曾经是通天人物，而她那些半通天的老朋友们对她的事还真是插不上手，所以就建议她另辟蹊径。

我们去见王老师、而不是她来找我们，是因为她刚到北京就不慎摔了一跤，把腿骨摔裂，住在医院里。在此之前她已经多次去过的她的原单位新华社，而新华社总是推推拖拖，前言不搭后语的，就是拖着不办。当然后来状子到了我先生的单位，也仍然是不了了之的结果。但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上面有人压着。任凭你个人再大的本事，上面的大气候不变，你也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一见面，我家先生就道出了老太太名字的出处，令老太太非常高兴。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有词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表现诗人厌倦官场的黑暗，弃官归隐，过平民百姓生活的愿望。王知还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辈曾任职北洋水师，父亲是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网上查到他当过舰长、海军供给总站站长）。这样的家庭，很有些文化，所以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她母亲也有文化，但是更热衷于官太太们之间的打牌聚会，对女儿感情淡漠。女儿也看不起母亲和官太太们无所事事的萎靡生活。这也是她后来向往延安、投奔革命的原因之一。

王知还是个聪颖上进的女子。她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和金陵女大英文系的高材生，喜欢写英文诗，上学期间就写了不少十四行诗，很受当时外教的欣赏。在校读书时还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向往革命。这期间，中共中央国际事务负责人王炳南聘请王知还做英文翻译，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向国外媒体说明事变真相时，也是请王知还做的翻译。受共产党人影响，王知还决定去延安参加革命，为此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新华社工作，并在那里和王炳南结婚。在延安，每个周末中央大礼堂都会有舞会，那些知识女青年都要去和中央领导跳舞。王知还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跳过舞。据她描述，毛泽东跳交谊舞比较笨拙，不是很好的舞伴。

1949年进京后，王知还在外交部工作。没料到这时王炳南的德国前妻安娜带着他们的孩子找了回来，要和王炳南复婚。这时王炳南已经是外交部主要领导之一。以考虑对外关系为由，周恩来亲自找王知还做工作，让她和王炳南离婚，以便王炳南和安娜的复婚。就这样，王知还被迫和王炳南离了婚。

从此，王知还被莫名其妙地多次调换单位，她想不通，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其时正值反右高潮，又与右派扯上了关系，遂被下放农村，很快又被新华社借故调出北京。走投无路的她这时想到了自己名字的出处，而自己正是那飞倦了的鸟，该回家了。可是家在哪呢？早年为了革命和父母决裂；在延安和王炳南生活期间又因为自己过敏体质几次怀孕都流产了；现在落了个孤身一人不说，革命同志也都把她抛弃了。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找在香港的父亲。一念之差，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到广州一下火车便被逮捕。她说她那时真是 *Naïve*（编者：天真、幼稚）到极点。想着下了火车以后就步行走到香港去。哪知道被捕押回北京后即被以叛国投敌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期间她也曾试图一直往南走，想走到云南，从那里出境。但是刚一出走就又被抓回。一直到文革结束，才被安徽安庆师范学院聘为临时英文教师。那时刚恢复高考，各地高校急需英语教师，还在劳改农场的王知还，被附近高校挖出来“人尽其才”。出来后才知道洞中才三月，世上已千年。经人劝说，遂寻觅故旧，四处托人，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平反之路。

我们当时的聊天谈话多跟她的申诉材料和如何解决平反问题有关，没有机会与她细谈她的生活经历。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因为她身后没有任何亲人怀念她，而我当时有最好的机会了解她。要紧的是，所有回忆王炳南的书籍和文章，没有一个提到他和王知还在延安的婚姻和生活，就好像王知还根本不存在。这太让人觉得不公平了。当然王老太太绝对不愿意自己的被人所知是因为王炳南的关系。她的自尊心极强。她想恢复多年前那个才华横溢的独立自由的自我。除了告状、养病，她一直在翻译一些中国古代诗词和“四·五期”间的天安门诗抄。

我在北京时曾以同情者的身份照顾她。她住院期间，天气热时，我会替她擦擦背；她想吃芦笋，北京哪里有卖这种东西的，我就满城各大市场转悠，居然也找到了落满灰尘的罐装芦笋。我原先从来没有听见过“芦笋”。她给我描绘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还告诉我英文怎么说，就是 Asparagus。我那时正在翻译一本西方现代艺术的书，少不了也会去找她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后来新华社给她安排了住处（最终也平了反），我则忙于考 TOEFL、出国留学，出国后更忙于生存，就跟王老师失去了联系。偶尔和先生也会念叨起她，但是直到在网上看到她逝去的消息，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前辈、好朋友。

王老师的去世还算寿终正寝（2013年8月去世，享年94岁），比起另一位跟王炳南有管的女人关露，她已经幸运了许多。现在想来，根据王炳南“以革命的名义”突然跟关露断交、后跟王知还结婚的时间来看，王知还是填充了王炳南跟安娜离婚、又遭遇组织干涉和关露的恋情期间的情感空挡。后来仍然是“以革命的名义”，王知还又让出了妻子的位置。世上真有如此 Ridiculous（编者：可笑、荒谬）的事情！被牺牲的偏偏都是女人，是对革命事业有杰出贡献的女人，是日后遭受自己的革命组织极为不公平待遇的女人。关露受压抑受迫害一辈子，挣扎到1982年的平反，最终还是孤苦伶仃单身一人，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吞服安眠药自尽。王知还活到了最后。余生还出版了两本翻译集和不少译文，也算找回了一些自我，释放了一些怨愤。

我又想到她的名字。她真是一只飞得太疲倦太疲倦的小鸟，现在总算飞还永久的家了。安息吧，王知还！

2014年元月

这样的土匪(散文)

它山

那一天，两河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首先宣布：“把五类分子押下去”以壮开场的声威。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地坝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

几个民兵吆五喝六从人堆里揪出黄必康和我两个右派、历史反革命王小谷和唐成淼、富农李绍洲，还有一个叫老二的，却冠以“土匪”帽子。他毫无畏惧，昂首挺胸抢先走在前头，身着蓝布衫，头缠白布包头，是山区里典型的剽悍而帅气的青年农民形象。

人们像争看押上刑场处决的罪犯那样前呼后拥，一片混乱。好几个女娃儿窃窃私语：他

是土匪？是的，我们就在他的引领下，被三杆步枪押去离地坝二十多米外的猪圈屋。叫我们在里边老老实实，悔过自新，不准出来。

(一)

屋里大半面积是猪圈，下边是粪坑。猪圈上有一小半搭着竹杆编排的床铺，老二就住在上面。各自找个石头当板凳坐下，老黄、老王与我低头无语。李绍洲拿出烟荷包卷叶子烟，老二爬上床头靠墙闭目养神。

我深感羞辱，并有被人作弄的愤恨。即或与历史反革命、富农坐在一起，那是政治问题，尚可接受。而叫人实难接受的，是我怎么会沦落到与土匪一起悔过自新的地步。自幼读的是圣贤书，立“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之志。岂能与鸡鸣狗盗为伍！

扪心自问，我非坏人。尽管头上有横加的右派桂冠，而我只认为自己是在五七革命狂潮中，是被自己人冲撞倒地遭到踩踏的不幸的受害者。下农村前夕，我默念着：“在三次沸水里煮过，在三次血水里滚过，在三次清水里浸过，我们就会比纯洁更纯洁了。”(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

此前，我从未听说老二是土匪，他和我在一个组里劳动已近半年。我刚到这里，就被揪上台亮过相，公布我的所谓右派反动言论。分到这个组是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要社员们仇视我，监督我，但是老二常常明里暗里在帮着我。

跟社员们一起插秧，我常常插出浮水秧。老二在一旁不声不响为我纠正，并帮我补插出更多的秧窝来，不让我落在后面太远。有什么重活难活脏活，组长也常常派他和我去，派个熟手带领辅助。原以为这是农民弟兄对一个文弱书生朴实的同情与怜悯之心，其实早已把我与土匪当作一流的了。

比如派我和他去给秧苗泼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技术性活。他自己挑大桶，却帮我选一挑小桶，怕我挑重了栽进水田里去。那些田塍窄如铁轨，他如履平地。泼秧田粪既费力又脏，泼不开、洒不出，往往泼到自己的头上来。操作都由他包了，只让我看着学习，或让我先打转往回走，但他常常泼完粪又赶到我的前面来了。从未催我，也不嫌弃，更无怨言。在路上他摇晃起一挑空桶，悠哉游哉边走边吼山歌：

小姑怪来，小姑怪 唉，
沿山沿岭找花戴 哟，
摘朵鲜花你拿来歪戴起，
闪悠闪悠逗人爱 哟！“

清澈、高亢的嗓音，好像是甩上了云端。翻滚腾挪，霞光四射，纷然而下，岭上的杜鹃花都开了。

歇息时，我递上一支劣质香烟，他摇头，坚持要抽自己卷的叶子烟。吧嗒吧嗒几口说，你那玩意儿不带劲。早些年辰，有个高鼻子洋人，赶场天提起猪腰子箢篼到街上、茶馆、饭铺里，见人就散烟，请你抽，不要钱。啥子“哈德门”、“美丽牌”、“强盗牌”多得很的名

堂。后来人们抽上了瘾，就要你掏钱买了。

我问，这是啥年月的事你都晓得？他说是爷爷摆的龙门阵(故事)。你爷爷住在哪儿？在鲤鱼河上面的南天门。开玩笑，你说的是孙悟空吧。他指着公社后山，从那个背后爬上去有个眼镜塘，那匹山下还有条鲤鱼河。那个南天门嘛，离天三尺三。

那你爷爷去哪里赶场喃？翻过去那边是贵州的羊磴、复兴，这边下坡去是万盛、桃子凼。左边垭口穿过去是海孔，三十里外是青羊寺，转上去是兴隆场，再翻过去就是贵州的赶水、桐梓了。想起那天我是从桃子凼被押进这个山沟里来的，走拢擦黑。经他这么一指点，我也捉摸出了自己被发配到这个山沟里的方位与深度。

他吧嗒着竹杆烟棒，自言自语，我的祖上也算是个朝庭里的人呵。我吃惊不小，赶紧集中注意力要听下去，他却慢吞吞地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爸爸那一辈，也是谏言犯上，削职充军到了夜郎(在今贵州西部)。到我爷爷那辈，兵荒马乱。只好迁移到南天门上来，烧山垦荒，种下好几匹坡的苞谷(玉蜀黍)。年年有吃不完的苞谷子，喂猪养牛，还积存起好多。背到场上去卖，秤盐打油，换点家用的东西。从祖祖爷爷下来已经六七辈人了，没见到从天而降的谕旨喊我们回去。唉，去他妈的娘呵，我从来就不信那个，也不想那些了！

我问，爷爷还在吗？十多年前病逝，土改前我的老巴汉(父亲)也跟着去了。现今他们都在南天门上，云里雾里，天天打山望喃。

我陷入一阵沉思。中国的流放史源远流长呵，而今 20 世纪的中国更有所发展，只是巧立个新名目罢了。一百年后我的孙子的孙子，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山沟里泼秧粪？不堪设想。突然，他敲落烟锅疤，一跃而起，干！

这时，有人来喊老二去桃子凼给乡供销社背货。他取出上大下小的倒尖背篼，上口可置放重物二百余斤，穿行于岩峡峭壁之间的羊肠小道上来去无碍。还有个丁字形的拐扒子，支柱下包有铁钉头，上有横档能托住篼底，支柱与两脚之间，能形成稳定的三角形。途中歇息、打尖(加餐)、抽烟时的稳定器。他跟我们做个似笑非笑的鬼脸，走了。

郁结在心的疑问，仍然是他怎么会是个土匪？便问起李绍洲老头，老二哪个会是土匪？他不紧不慢闭着眼睛卖关子，老二就是土匪嘛，你还不明白？我说，这等于说我是右你是富农一样的明白。他立即睁开眼来，急切地说道：老二就是棒老二，棒老二就是土匪！哦，我明白了，俗语中的梭子、棒客、老二、棒老二都指的是土匪。

只好递支烟给他消气，他欣然接受。慢慢点着，深深地吸上了一口。说，他这个土匪嘛有点冤，祖上尽是些知书达礼之人。老巴汉死了后，只剩下他和一个女娃儿，他的妹。山上人家有吃不完的苞谷子，只是茅林草荒的山路难走，最费的是裤儿。衣服能穿几代人，就是裤儿烂得快。直到一家人，有三五个男人女人一共只剩下一条裤子了，就只能给下山卖苞谷子办事的穿起裤儿去赶场。

那山上人家穿啥？穿的是从我们这些平坝(其实是大山脚下)年年插秧剩下的秧苗，晒干后编结成铺盖、围裙或是蓑衣背心。眼看他妹长大成人，当哥的着急。我们这个坝儿虽然穷，但是“有女不嫁高山郎”。高山上的漂亮女娃儿都会嫁到山下来，你不信去看看坝上哪家的媳妇不是有眉有眼的？

想给他妹添条裤子，背了几趟苞谷子去场上卖。凑够了钱去扯布，哪晓得那天场上的布摊都收场了，必须等到三天之后下次赶场再来。在返回的途中，到垮垮桥那些地方，有个穿新裤子的女娃走来，他硬要买人家的那条新裤儿，东说西说人家当然不愿意。他急了，用拐扒子钉头杵着对方，你不卖我就要啷门啷门。女娃被吓住了，把裤儿脱下来。他把卖苞谷子的钱全部给她，又把自己戴的破草帽丢给她，叫她遮住下半截快点回家去吧。

随后追查到乡里来，才晓得是他干的这种荒唐事，定为土匪。土改时枪毙这湾子里仅有的一名地主，为壮声势，把他押去陪过杀场。后来成立合作社，他的妹嫁给了社长的儿子，把他弄下山来住在这个猪圈屋里。

哦，这样的“土匪”！？

(二)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要宣传人民公社的光辉前景，把我叫到公社去写写画画。做了不少的幸福路、天堂路、共产路、北京路等等牌子，插到田边地角，显示共产主义的美梦就在眼前。同时，我要为集中起来喂养的耕牛割草，天黑前又赶去组上记工分，夜里去教社员识字，要求以大跃进争上游的精神在一个月之内扫除文盲。这段时间里，累得我昏天黑地。

老二成为专职背二哥，天天为大炼钢铁背矿石。在公社集体食堂偶尔碰见，他累得疲踏嘴歪，无话可说。有天晚上，民兵用枪押着我俩去各家各户收缴锅头碗盏，挖灶砸缸，不准社员家里的锅灶冒烟。我们相互看了一眼，没说上一句话。

这年的秋冬季里，更搞得人人晕头转向。为保“钢铁元帅”升帐，精壮劳力集中炼钢去了。调动剩下的老弱病残男女社员，携几带女，牵上耕牛，翻山越岭去收割另一个生产队里的几块水稻田，或是拉到另一个在山湾里的生产队去铲草积肥。说这叫做“大兵团作战”（毛泽东的人海战术），以展示人民公社力量大，超英赶美不在话下，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这一年山坡上的大遍红苕地，没有劳力去挖。烂在地里当成了小春作物的肥料了。但是又搞什么深耕、密植，山区的土地深不过一尺，其下就是石头；至于密植，播下的小麦种密到麦粒挨着麦粒成堆。第二年开春，麦苗如丝。扯去喂牛，牛也不吃。说是牛儿嫌它毫无嚼头，因为太绒了。

折腾掉几多人力、物力与时间，这正是人民公社开局时扯风扯闪的症状。后来有人说那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头脑发烧，怎么会弄得八亿神州跟着发疯呢？其中值得几代人深思反省，在此不赘。

据说，毛泽东读了一本苏联教科书《土壤学》，就搞出一个《农业八字宪法》，其中有“深、密、水、肥”四字。所以要深耕，密植，积肥，搞水利。

有一天公社把我喊去，要我上山找水源，策划修建一个大水库。我再三说自己不行，书记丢一本建小水库的小册子给我，骂骂咧咧地说，你读他妈 B 的书读到牛尾巴去啦？去看看这本小书就行！

读完小册子，我要求派个熟悉山路水源的人。不几天派出老二来跟我上山，让人喜出望外。

老二背上一些自制工具。一手拿把鹰嘴砍刀，一手执着红白相间每格 20 公分的花杆。公

社交给我一个区上拨下来的像玩具小手枪的水准仪，自制一根 1.5 米的竹棍，作为仪器观测支架，还有一饼 100 公尺的尺子，我们出发了。

走出公社七八百米，正要转拐上山，他的妹妹赶上来了。跟他说了一阵话，交给他一个老蓝布包。

我第一次见到世上有如此英俊的美女，浓眉大眼，无以言表的朴实、清新、纯正。白布包头，蓝布衫，青布鞋。我心里只有一句话：难怪她的哥哥能够为她做出那样空前的荒唐事来！

爬到第一台山头，我问送来一包什么东西？他仰望高山，说给祖宗点香烧纸，叩头禀告：我妹和我都活着呐，望祖先在天之灵保佑。

他妹还真有孝心咯，这年头有几个人想得起这些？

她晓得我们要上山找水，就谎称去场上检查身孕。费了不少周折，才买到这些香钱纸烛。共产党说这是迷信，不准祭祖先，不兴孝敬父母，教唆儿女跟与地主富农有点沾亲带故的父母，或者父母的祖上是大户人家的，都要理清清楚阶级界线，坚定立场，批判旧思想，破除旧风俗等等。

譬如说我的祖上尽管是充了军的，还说是官僚地主分子，说我们是剥削阶级的后代血脉，叫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划清界线，背叛祖宗。不过后来他们又说是啥子东西破落的“官僚自耕农”，这不知道是从那个本本上找出来的？去他妈的娘，反正由他们编些龙门阵来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总之想方设法要把你踩在脚下，他要高你一篾片(竹片)才安逸。

婆家人在党的多，都信毛主席的教，她只能躲着瞒着他们去做。今天早上在食堂里，她老盯着我有话要说的样子，又没有敢说，不晓得有啥子事？刚才是她赶上的。我当哥的没想起这些，她都想到了。

听着他的娓娓叙述，我凝望着万古苍天。人，终究是人呵……

手中有公社介绍信，可吃可住，可以请队上派人协助云云。在龙背生产队住下，开始勘查。

那里有座峭壁，有个碗口大的飞瀑喷射而出，这是山顶上沉浸而下的龙洞水，早已由村民们利用并灌溉着一湾子梯田，当然无需我们到此劳神。再寻找到一处叫坪上的地方，有个天然盆口，约十来亩，收水面积不小。但在靠边底部有个溶洞，洞口约两米对径。在当时没有钢筋水泥，全靠土石方堆砌的物质条件下，即使建起水库来也很难保证蓄水。正如后来人们讥讽大跃进中所建的水利成果：“一朝号令下，千军万马修堰塘；晚上装月亮，白天装太阳。”

让人颇费思索。老二建议上南天门去，那里有眼镜塘的水，那边还有鲤鱼河。当然有其私心之嫌，但不无道理。从高处观察地势走向心中有数，二来山上有水，至少可以引水下山。好，用粮票兑出七八天口粮，带点食盐出发。睡哪里？他一口保证让我睡得香，睡得甜。

到达目的地，远远望见那座背靠山凹的老房子。屋顶瓦片坍塌稀落，门窗不全，四壁残破不堪。但筋骨犹存，屋脊翘角仍然展示出风雨今昔屹立不倒的顽强精神。

在偏搭屋里，有灶、水缸与火塘。他找出柴块、树圪篼升起火来，让我坐在火塘边烤火。他去附近的苗家邻居弄点吃的，叫我等着吃晚饭，还说有酒喝。

高山上月，慢慢升起来了，格外澄澈、清幽。让人想起云南民歌：“月亮出来亮旺旺，亮旺旺；好像阿妹在天上走呵，走呵……”。我由衷佩服山民们的才华与智慧，创造出了如此绝妙的意境，扣人心弦的神韵。当然，让我更敬佩的是大自然幻化造就出如此神奇的人间仙境。徜徉其间，我醉了。

夜已深，他背着大稀眼背篼重着背篼回来，两手提着东西。把压满背篼里的包谷壳倾倒在地，似若一匹小山。不是柴火，是叫我钻进去睡觉的窝。提回一捆竹筒饭，另有一竹筒的苗家米酒，还有炒胡豆、烧红苕。这是我被押解进山以来，享受到的一顿最丰盛的晚餐。米酒好喝，后劲不小。我早已睡意迷糊，钻进包谷壳里，露出两只鼻孔。有阵阵葡萄糖的丝丝香甜袭来，不知今夕何夕？

天大亮，老二睡在火塘边，夜里添加过多次柴火？感谢他保住了一夜的温暖。应该享受好梦踟蹰的余温，不可惊醒他。

我独自出去，伸伸懒腰。晨光里，寂静的山谷，清新的空气，隐约其间的鸟鸣，犬吠，山鸡的远啼。让人感到一颗在凡世尘俗里浸泡已久不洁的心灵，来到这样清新明澈的世界里只有羞愧与懊悔。何不就此聊乘化而归去来兮？然而……

步入正屋，只见四壁残留的白垩墙块之上，有密密麻麻的墨迹。是一些看不清，读不懂的词语，有的正楷，有的是行书。透露着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氤氲。从无法卒读的墨迹中，找到了较为完整的有“……巴茅无锐强作弩，枉自男儿放悲声”之句，但不知蕴含什么深意？

老二起来后，我急于询问。他却要带我去一泓山泉边洗漱，有一句无一声地开口说道。爷爷的老汉(爸爸)在世时，也住在这里。还教过爷爷学习诗文，有期待朝庭开恩降旨召回京城去的奢望，后来世道大变，渺无音信。我还是娃娃的时候，这里早已有诗文题写在壁头上，有记四季风雨的，有苦吟战乱身世的，祈盼国泰民安的，有感慨世象变幻的。老二还能随口背诵出一些来，但我都记不住。

爷爷和父亲先后都教过兄妹俩背诵唐诗宋词，以及这些壁头上的诗文，完全口传心授。学过写字，早先用毛笔沾墨水在一块姜黄漆板上写，后来家境愈渐贫困，就只有用巴茅杆沾红色泥巴水写。从小帮家里砍柴、喂猪、喂牛、煮饭，只能抽空看着壁头上的诗文，眼识心记。识得不少字，也不需要公社啥子速成扫盲了。

他背诵出那两句诗的前半部分，和前后几首，我都无法记住。他讲起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有一个颇含深意的故事：

民国之初，有一个县，由中央政府派来一个县大老爷。那时已经叫县长了，是个留过洋的人。押送到县上的土匪头子通常是按老规矩砍头处决，把人头挂上城门示众。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已经是民国了，必须用枪行刑，这才文明。

但是县里没有洋枪，只找到一支铳子(火药枪)，用打鸟打兔的家伙来处决犯人，这尤如娃娃们用巴茅杆当箭弩，竹片当刀撕杀的一场儿戏，正如四川人常说的跟“拌灯”(开玩笑)一样。一枪扣响，犯人惨叫不已，浑身上下留着无数的铁沙子弹孔。抽筋打抖，痛不欲生，声

声哀求用大刀砍脑壳。街坊百姓夜闻凄厉的悲鸣呼号，无不泪下。

我趁此问起老二陪杀场的事。他却毫无顾忌，坦然说起。我并不怕死，就怕他们用火药枪。枪响了，我没死。那个地主的脑壳开了花，脑浆四溅，这时我才真正害怕起来。这些狗日的屁眼黑呵，兴打脑壳，叫做“敲沙罐”，比用刀砍还黑！

我想起当前日以继夜的土法炼钢、疲于奔命的大兵团作战、吃集体食堂，在山前山后的男女老少为吃一餐饭的辛苦爬涉、集中饲养牲畜，饿得牛羊乱窜逃跑、一个月扫除文盲、要我这个读半天小册子的修建大水库。不实事求是，搞花架子，喊口号，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这都尤如鸟枪处决犯人，这是文明的痛楚，是超越的荒谬？还是英明领袖乌托邦狂躁症的大发作？

而今让我们这两个“阶级敌人”，勘查修建水库的地点。凭那本小册子去找，这不也是没有洋枪用铳子冒充文明吗？这将会造福于人民，或是在造孽？那只有天知道了。但是，我俩个身系樊笼之人，还是以戴罪立功的认真表现，早出晚归，跋涉于山上山下。

饿了，老二烧起篝火做竹筒饭，竹筒装进米和包谷粉，加水，添加些从山里摘来的小红果，味酸甜，俗称红子。竹叶子塞住端口，放在火上烘烤。熟了，劈开竹筒食用。晚上更丰富，有采回的竹笋、蘑菇、木耳炖在瓦罐里当菜吃，喝热汤。

饭后，月光很好，老二出去窜门了。我煮一壶从树上刚刚摘下的老荫茶，坐在地坝边品茶赏月。恍忽间，有一种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的佛门境界，忘乎所以的愉悦和潇洒。真有点梦里不知身是客，乐不思蜀了。

前后左右踏勘完毕，找不到一处适合建水库的地方。这里都是喀斯特地貌，溶洞遍野，阴河暗流四布。老二说的眼镜塘，也是从溶洞里沉浸出来的水面，天旱时，水都不见了。至于鲤鱼河是在那座大山背后的山脚下，除非开凿一条50多公里的隧道才能把水引过来，这根本不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事。

尽管当时报纸上有“人定胜天”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通栏大标题的号召，有“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诗句的鼓动，也有水稻亩产11万斤的卫星上天的报道诱惑。但我这个平凡的右派脑壳，总还是“疯”不起来。

睡了五个晚上的包谷壳，甜丝丝的香味催人入睡；包谷壳蜇得我焦躁不安，总想不出一点门路来。第六个晚上忽然想到，在这丛山峻岭之下，左右两边的山谷形成的两条山沟，溪水汇集到公社前面，所以那里叫两河口。修建水库，正是最理想的地方，也是最合乎大跃进精神的大胆设想。但是，公社必须往山上搬迁，而且放出的水，只能灌溉下游地区。书记答应吗？可能是一顿大大升级的臭骂：你是把书读到牛屁眼里头去啦！

可是我能奈何？跟老二商量回去如何交代？他坚决反对我的意见。不仅会骂你，恐怕要把你当成反革命毙了。两河口是他从闹土改起，步步升官发家的宝地，你要淹起来作水库？他不会明讲你在搞啥子板眼，他会歪起屁眼说你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他下套，用心恶毒，妄图摧毁人民公社！你吃得消吗？

然后，他说就在坪上的喇叭口建水库。我说溶洞怎么堵得住？他说空手回去，更交不了

差，只得报上这个。我说，以后发生漏水良心过不去。他几乎冒火了，你要良心，哪得交出一条命。我想，不会那么严重吧。他却苦口婆心唠叨到半夜。

他讲述了一些自从农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干出过多少“没良心”的事。比如那个他跟着陪杀场的地主，原本是个在这里兴办义学的绅良。乡里的娃儿一律免费上学，免费供应伙食呐，公社后面那些大瓦房都是原先的义校，现在的两河小学。就是这个积德为善的好人，也跑不脱被共产党敲沙罐的下场。至于现在这些公社干部，比旧社会的乡长、地主、保甲长还要黑。只要你违背了他的利益，你怕他不会把你往死里边整！？

这时，我才认识到老二的脑壳里不是豆渣，也绝非荒唐。

最后我同意再到坪上去，测定可容方量，选定建坝地址，估算土石方量。同时说明溶洞，难以保持蓄水问题。至于能否修建，依老二所说，一切请领导斩指。总之要找个桩柱，做个样子交差，第二天我们继续忙了一天。

晚上， he去归还东西。很晚很晚才回来，但是很早很早就起来了，他不能忘记祭拜祖先，祈求在天之灵的保佑。凡是他祭拜的坟头，我也跟着三鞠躬。并拣出一炷香，一沓纸钱，向着心中的远方，祝愿二老安息。请原谅你们不肖不孝的儿子只能在这山高皇帝远，共产党还管不着的山头上，默默遥寄一片心意。

我们下山时，老二打“啊火”(无词的叫喊)，远处回应着几声女娃儿的“啊火”声，一位盛装苗族姑娘站在山头上频频挥手。老二回头，挥动着花杆，啊火---啊火-----啊火----。

路上，他欣喜地又吼起了山歌：

昨夜联妹去得高 嘲
手里捏个火焰包(火槁) 啊
爬到半坡焰包息
哪个石头没摸交(到) 哟

(三)

回到公社，一片萧条。

不见土高炉冒烟了，人们带着碗筷在食堂里等开饭。老头老婆婆在打壳睡，小孩们在一旁抓子玩耍。几个中年社员早已收工回来，卷着烟叶，小声摆谈有的公社几个月前就没有粮食了，饿死了人。有的人挖白鳝泥吃，屙不屎出来，就过掏出，把屁眼掏烂了，流了好多血，快死速啦。

据说，我们上山那天中午便宣布第二天起，每人每月供给 8 市斤毛粮。上山时，因公出差特别照顾，还是以每人每月 21 市斤粮票发给我俩的，回来才感到问题严重。

书记愁眉不展，对我们的汇报淡心无肠地听着，一边卷叶子烟。听完，叫把材料留下，他手一挥，走！我俩提心吊胆准备挨骂的心，终于安全着陆，回到组里劳动，各就各位。

回想起公社成立之初，办集体食堂。挖灶砸锅，不许社员家里冒烟。公社食堂让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不定量。尽管有许多不便与困惑，但人们冲着取消定量(原定每人每月 24 市斤)

的甜头，人们尚能隐忍接受这种又爱又怕的瞎折腾。即使有许多抱怨不满，但相遇在食堂还是有许多嬉哈打笑的声响，现在大家面面相觑，沉默寡言。

其后，粮食亏欠(口粮也被征收了)，参杂吃粗。参入连着苞谷芯子磨出的苞谷粉，豆类菜蔬，甚至以红苕叶、南爪叶等添加在内以保持份量。即便如此找替代品也无以为继，一而再地降低定量。而且参入的粗粮杂品一律折算为口粮，实际下肚的粮食所剩无几。近乎猪饲料，只能见到几粒米，几点包谷粉皮。更有甚者，把稻谷连谷壳磨出来的东西，不筛不去粗壳，直接上笼蒸出来的饭叫做“谷沙沙”。吃得我疮疮出血，招惹起社员们的取笑，说是月经来了。

只有这些天挖红苕，按 1: 6 折算，吃过几顿堆头大的饭，可是人人屁洒连天。晚上队里开会，屁声此起彼落。队长不能忍受干扰他传达上级重要指示的严肃性，义正词严地命令大家：“夹紧点，忍着点！”不过话音刚落，他自己在台上却放出了一个十分嚣张而悠长的屁。

当晚宣布，明天全体动员送交爱国公粮，除老弱病残外一律出动。每人按背的重量计算当日的工分，超出的奖励，不够的扣分。送到粮站可按背粮多少，每人可领到粮票半斤至一斤为午餐之用，这是人们最最看重的一点，有的老弱也在争取参加。而我这个右派并不想去吃半斤白米饭，明知自己负重 70 斤(不达定额，属扣工分之列)远行约 50 华里，实难胜任。但我是右派，不可违抗。

刚刚背到垮垮桥我几乎瘫倒在地，是老二背两百斤到达桃子凼粮站交差之后返回。见到我如此狼狈，二话莫说，背起我的一背公粮如箭飞奔而去，留下他的倒尖背篼与我。叫我随后赶上去领粮票。

定额不够百斤，我无脸去领取粮票。老二推着我走到粮站，跟站上说明是我背的，登记我的名字。他又补充，虽说不达定额，但是送爱国公粮的爱国精神很够咯。我只想把公粮交到，有个记录证明，转身就走。那人见我一条浅灰色长裤被血迹污染大半，他冲出粮站来，硬塞进我上衣荷里一斤粮票。我拒绝，他很快转身回去，一边挥手说：“同志，快回去，好好休息！”

老二挡住我要把粮票交回去，硬拽着我去吃饭。边走边说，自己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吃谷沙沙，吃红苕棒儿，还要把粮食缴给公家，爱这个国。这是啥世道呵？我们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他妈 B 三皇五帝啦，你说就这么吃回来一两斤票票，还得自己掏钱又哪点不该嘛？

到饭馆叫上干饭与“河汤”(免费清水汤)。我吃下三两粮，老二吃了两个冒二头(一个大碗饭上盖加一小碗，即半斤粮)用去一斤粮票。我把剩的粮票给老二，他一下子火了，掉头就往前走去。我赶到垮垮桥时，他在桥头吧扎着叶子烟等我一道走。

半路上听到来往行人传播小道消息，说是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这几个晚上飞凌上空，投下了传单和粮食。民兵收缴了传单，还对社员宣传，说粮食里头有毒药，不能吃，不准吃。有的胆子大，一家人饿得心慌，悄悄煮来大人小孩都吃啦，百毛事都没得。而且天天晚上又爬上坡去守候飞机，盼着再来哩。

至于传单上说些什么？乱说纷纭。其中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叫老百姓等着，我们一定

要打回来！有的说得更玄，说开飞机的走下来，跟人们交谈打听在什么湾里坪里，他的婆婆爷爷，妈和老汉还活着没有？

我催促老二快点走，生怕被人看见我们在注意倾听，如有人去汇报了，我俩就会摊上大麻烦。走到远处，老二回过头来对我说：这样的朝庭让百姓吃不饱饭，还拿来捞个迷哇。

我只能催他走快点，到没人处一本正经地说，千万莫去传，更莫要说自己听到过什么。他说，我只听到人家一路上在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

住家户主人看见我裤子上血迹斑斑，在火塘上熬了一罐草药，叫我洗，渴了一大碗。太疲倦，近乎麻木不知疼痛。第二天确实好多了。

公社召集队长、组长、民兵包括党团员都去开会，剩下的人员继续挖没有来得及挖回的红苕。多半已经腐烂，只能把一些根根苕挖出来，交食堂当口粮。今天头头们和积极分子都不在，人们各自把苕疙瘩就地生吃开来。几个妇女在一起说悄悄话，说在半夜里起来捡天上掉下来的馒头包子。老二和我心里明白，朝前挖去。老二说，看来那些消息像是真的。我无法回答，生怕惹出麻烦。

但是，当晚麻烦就来了。

公杜派出两个民兵前来，要我和老二跟他们去搜山。老二已被押来，捏把鹰咀砍刀。我没有家伙，把户主的蒙子树带刺的棍子提上出发了。但是命令我和老二走前头，带枪的民兵走在后头，不像是去搜山，倒像是押上刑场。

老二又是抢在前头走，叫我跟上。悄悄说：我说这些人屁眼黑嘛，你还不信？根本不把我两个当成大人，只当是撵山的狗儿跑前头。就算我们是“阶级敌人”，也是人呀。当然，这些龟孙子原本也不算黑，自从入了党，当上民兵，屁眼马上就黑，黑得发亮！

我们之外，另有人马在搜索其它几处。那是个月黑头的夜晚，哪来的飞机凌空？不过，这种安排，的确心怀叵测，叫我俩个走前头，踩地雷。我只知道法西斯德军、日军才干过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押着对方的老百姓走在前头，用生命去踩踏雷区，为他们扫清道路。

可是，万一今晚真的有空投特务，老二有把砍刀，我只有根棍子，怎能对付真刀真枪？而且两杆枪在后监视着我俩的行动，随时可以借故朝我俩背后开枪。没有被敌人打死，反遭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土地上的共产党民兵黑了。真他妈的遇上了一场生死难料的人生险棋，进退两难的境地。

老二不紧张，我很紧张。万一是真的来了咋办？他心不在焉地说，来了，他们不会开枪。空投下来是要到人群中去，不是来跟你我打仗的。

我说万一遭遇上了怎么办？他却说，就喊：我们是老百姓，一个祖先的同胞，不要开枪！

我说，那不是投敌叛国吗？后面两个不把我们先敲了？

他说，他们不敢。开枪就暴露，他两个死得快。

民兵掉得老远，十分放心我们，或是胆劫迟疑不前？老二继续说，啥子东西投敌叛国哟？又不是日本鬼子来了，都是中国人。我爷爷讲过，早些年湖南、湖北、贵州、四川，有红边

边与白边边两股军队打仗。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打过来打过去。吃粮当兵的人本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脱就喊：我们都是一個祖先的同胞弟兄，不要开枪呵！

他有根有据，还会搞统战。我说如果像电影上演的那样悄无声息用刀子先把我俩个解决了，怎么办？

那是祖宗不保佑，只得先光荣了，也许还会是个烈士？

我说，那他们并不黑嘛，还会报告我俩个是烈士？

他像被山马蜂蛰了，一下子急跳起来：不，不，烈士还是留给他们当！

这时远处灌木丛中有枝桠折断声响，他一手挡住我前进。躲在土堆后面，我们相互能听到急迫的呼吸与心跳声，几乎淹没了一切响动。稍后，老二才抬头张望，倾听，打手势，叫我千万莫出声。

不远处的灌木丛林映照在昏暗的天际，有一处树冠在摇动。如果是风，那是一片波涛，不会集中在一处。是人？是鬼？是空投？我心里在打鼓。

一阵沉寂之后，老二提起砍刀直往前去，却安排我爬上一棵大树桠上等他。我要去，他说，野猪比空投还凶！

不多时我实在按捺不住，跟踪寻去。管他妈的是人、是鬼、是空投、是野猪，决不能让他一个人担当风险。摸到林子边上，他却唛唛唛地唤着，用棕叶搓成的绳子牵着一只大黑山羊回来了。他说，这就是空投特务！两个民兵赶来，外号叫麻杆的说，这是公社里那只逃跑了的山羊嘛！

第二天，书记在食堂里表扬那两个民兵找回了公社的大黑山羊。只字未提老二，老二喝完像猪饲料的羹羹正在卷烟叶。

（五）

情况越来越严重，食堂无米下炊，几乎是一日三餐清水煮牛皮菜。各家各户在自家的火塘里煮凡能找回来的野果野蔬作补充，食堂正在自动瓦解消亡之中。

这时，市文化系统集中下放干部和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在一起，为区上修一条通向各个公社的公路。粮食定量 18 市斤毛粮，比起农民来可说有天壤之别，我也算是从即将被饥饿灭顶的大浪里冲向一块浅滩上，暂且得救。

我意外地被选去协助施工，派我去区上买米厘纸。跑遍通街没有，甚至连名称都没听说过。最后找到一处修铁路的测绘组，要到几张。天色已晚，摸黑回去这段山路很危险，留下住店既无钱又无介绍信，寸步难行。正如当年老二卖苞谷子收到了钱，却无处买布给他妹做裤子，十分焦急。

有位仁兄走来问我，你从哪里转业的？他看见我穿一件旧军服，上有铜制纽扣，铸着空军徽标。

我焦急无奈，顺口而出：华北空政。

他很兴奋地摸出一个红皮回乡转业证递给我，他原是华北空军所属的京郊南苑机场警卫连里的一个班长，复原回到璧山老家，逃荒出来本想翻过山去贵州谋生。到此被抓进了游民收容所，他隐瞒一切谎称从东北入关，操几句东北话，是个无亲无友无业的流浪汉。本姓张，

改为王，又乱说些永远找不到的地址。

此时，真有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我说从北京转业回来，老家也是璧山，在重庆工作。当了右派正在劳改之中，出差到此，不知今宵何处？

他一把拉着我，往一座约有 30x15 公尺的茅草盖顶楠竹捆绑的工棚走去。边走边说，战友加同乡，落难至此，岂能袖手旁观。走，有吃有喝有住，老弟全包了。一股川人的梁山义气，让我热血沸腾。

工棚四周排满上下铺的双人床，当中烧起四五堆篝火。一圈一圈穿着五花八门衣服的人，有的还打着赤膊，有的披着毯子在烤，人声嘈杂。骤然间有进入丐邦群落的感觉。

有人朝我走来，原来是老二。他大声武气呼叫：老右兄你也来啦！我俩在热泪盈眶中互相握住对方的手不放。老王很激动地扶着我俩肩膀说，原来都是熟人？

老二说，岂止熟人，生死弟兄！介绍老王是他们的班长，老王转身过来说，老二是他的得力助手，副班长，不过是他私下任命的。命令老二快去弄点吃的给老战友洗尘。把我弄得来仿佛在梦中。

老二弄来馒头和咸菜，一罐老白干。边喝边吃，我们在一起摆谈各自的经历，几乎是一个通宵。

这里都是被游民收容所交到这里来的民工，是无法遣返的游民，其中有许多是遣返多次又自动跑回来的，有隐瞒真实姓名地址而当地回复查无此人的，当然也可能有收容所懒得遣返直接交来搞土石方工程，从中提点成，坐收渔利。

这里不发工资，只管吃饱饭。定量很高，敞开吃饭。仅凭这一点，就有许多人混进来当不要工钱的民工。老二就是这样来的，他劝我加入这个队伍，说什么右派、左派？活着，就是正派，对得起祖宗。老王却反对，认为还没沦落到农民的境地，有组织管到的，有皇粮可吃，不必来下这个地狱。

第二天，大天亮，工棚内空无一人。床头上摆着三个大馒头，每个足有半斤。捡来个烟盒，翻开包装皮，用篝火余烬中的炭条写下“后会有期”。放在床头，我走了。

不久，我被转移到长寿湖去了。从此，同天异地，各自在生死线上挣扎。

这些年来，我深深惭愧自责。尽管我能想起老二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如在眼前，总想不起他的名字。也许我问过他的本名本姓，或许在那荒唐的年代里根本就没有问过，随大流接受把他踩在脚下的蔑视性绰号。也曾凭着这个绰号去打听过老二的下落，一切物是人非。恍如我是天外来客，都以惊疑的目光望着我。

这样的疏失，让我终生留下对他的歉疚与遗憾。又是清明，很想为他点炷香，烧些纸，但是我坚信他还活着。正如老二所说：不然，对不起祖宗！

聊备数言，志之：

后会有期未有期
天涯生死可问谁
我欲祭君疑君在
青山耿耿大雁归

2013 清明 2013.5 定稿

石板坡看守所

牛立华

据说“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被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确定为敌我矛盾，承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宽大为怀，仍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进入 1958 年，多数右派分子陆陆续续被抓进了关押罪犯的看守所。一部分等待判刑，一部分劳动教养。由此领略到了中共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原来是被列为专政对象，不定期关押，置人九死一生的严酷与残忍。

1958 年 7 月 4 日我被“宽大”到重庆石板坡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个临时转运站，总部在重庆石板坡。反右和大跃进以来，公安部门抓的人越来越多，原来的看守所容纳不下，新开辟了不少据点，抓进来的人先在这些转运站临时关几天或几十天，然后分发到各地。

转运站位于重庆下半城，当时的门牌大约是解放东路九十六号，坐南朝北面临狭窄的街道，有两道铁栅栏门，左右各有一个木制岗亭，由持枪武警值守。路上的行人是不准接近这铁栅栏门的。里面靠两边的墙壁是两排木板搭建的通铺，除了木板铺以外，空无一物，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或者凳子，甚至没有一把扫帚。

被关进来的人一般都是匆匆忙忙地被押解来的，只带着很简单的行李，因为是夏天，无需盖被子，一个个无精打采、愁眉苦脸地或卷缩着身子或伸直双腿靠着墙坐在铺上。白天在铺上学习（读重庆日报），夜晚在铺上睡觉，开饭时在铺上就餐，思家时在铺上流泪，忧国时在铺上哀叹。

我是下午六点多钟被关进这个看守所的，大约一百平方米的房间已经收容了十几个人，及至晚上八点钟还不断地有人来，九点钟左右，长长的木板铺已经挤满了四十多位相互陌生的“同学”。“同学”是看守所规定的称呼，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偷盗者、贪污者、诈骗者、男女关系不正常者、被诬告与陷害者……被冠以上述帽子而送劳动教养的各类人员，一律称为同学，在这里相互学习。

当夜无话。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每人发一瓢稀饭，十几个人一小盆咸菜。刚吃完就来了两个看守，忙不迭的点名，然后宣布纪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串通案情、不准高声喧哗、不准……等等。

才关进来的人心神不定，没有注意听，如今更记不住有哪些内容了，当时的感觉就是严厉，透露着腾腾杀气。

随后是规规矩矩地坐下读报。说是读报，实际上是指定一个人在那里有气无力地照着报纸念念有词，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刚刚被抓进来，生死存亡未保，前途难以预料，心事重重，情绪不稳，谁还有心听那重复谎言的读报呢？

转运站的公安干警是不管思想改造的，属于临时看守性质，只要关进来的人不逃跑，不惹事，一般是不闻不问的。

因为我原籍北京，普通话比较标准，所以被指定为读报人，还兼任学习组长，负责来人登记和维持室内秩序。好在多数人都是知书达理的，刚刚进到看守所还有点恐惧和陌生感，处处小心，不惹是生非，很好管理。

临近九点钟，铁栅栏门外来了一个女学生，因为我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所以发现的比较早，也看得比较清楚。

她胆怯怯地在铁栅栏门外来回走，眼睛始终盯着略显黑暗的大房子转来转去，像是找寻什么人。她年龄二十岁左右，眉清目秀，朴实无华。明亮的眼睛，聪慧与纯真同在；齐耳的秀发，活力与温柔共存；岗亭里的武警看着这么漂亮而又天真的女学生近在咫尺，不像恐怖分子，竟然没有横加干涉。

靠里面坐着的一个小伙子忽地站了起来，往门前走了两步，像是要去会见这个女孩，离铁栅栏门还有三米却犹豫不决地停住了脚步，用手扶了扶眼镜，不知所措。我看了看登记簿，他是昨天下午八点多钟送来的，西南师范大学三年级学生，右派分子，看来胆子挺小的。

这时候旁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室友问他：“门口那个是你什么人？”他回答说：“女朋友”，这位年长的室友给他出主意说：“你尽管去，武警要问就说是你妹妹，劳动教养没有剥夺公民权，不能拒绝探视，跟他们讲道理。”

小伙子这才走到门口，隔着两道铁栅栏和那个女孩子打招呼。左边那个武警面无表情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大声回答说：“她是我妹妹，问我要什么衣服和生活用品”。武警说：“快点，不要耽误时间。”我坐在铺上暗自好笑，这个小伙子胆子大了，聪明了，学会说谎了。

这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隔着两道铁栅栏门，轻声地说着什么，恋恋不舍的嘀咕了至少有十五分钟吧。武警居然没有再过问。

他们大概也相信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幻想着经过一年半载或最多两年劳动教养的惩罚就可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甚至重新入团、入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继续自己的事业，构建幸福的家庭。

现在回想起来，周恩来的这句话当时不知道蒙蔽和麻痹了多少人。1958 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都被投入苦难的深渊，即使解除劳动教养也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教（劳改）单位，中共中央有个“多留少放”的内部指示，摘掉帽子的叫“摘帽右派”，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许多才华洋溢的青年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了，直到临死还对共产党抱着幻想。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就是这样敞开着的，原来那是地狱之门。

一个浙江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县沙坪茶场劳动教养，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天天干着开荒种地的营生，1965年积劳成疾，重病之际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人活一辈子要学习一辈子，改造是无限的，惩罚却应该是有限的，我相信党不会惩罚我一辈子吧！”他在深山老林里劳教三年多，又被强制留在农场四年多，总共八年多的时间，只落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临近人生的终点，还沉迷在美丽的也是虚无的梦幻之中，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惩罚他一辈子。一天夜里，他终于闭上了眼睛，他是含着笑还是噙着泪从地狱走向天堂的呢？

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那两个年轻人隔着铁栅栏门会面的场景，仍历历如在目前。女学生忧郁无助的眼睛，男青年激愤无奈的目光，依然令人难忘。他们还活着吗？他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呢？他什么时候摘的帽子呢？得到“改正”了吗？她一直等着他吗？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几十年光阴，一个个问题，我去问谁呢？

第三天中午临近十一点钟，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前，车上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个走到岗亭跟前，拿出介绍信给值班武警，武警走出岗亭，开了外面的铁栅栏门又开了里面的铁栅栏门，随后让站在旁边那个肤色黝黑、体型健美的青年提着简单的行李进了看守所，两道铁栅栏门哗啦、哗啦又关上了。

进来的这个人大约二十五六岁，身高1.8米左右，上身穿铁红色运动衫，下身穿蓝灰色体操裤。胸肌饱满，肩平背直。两道剑眉如墨，两眼炯炯如珠。

他进门来，向前跨了一步，仍然提着行李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这个房间，一副怒气未消的神态，看样子是才从批斗会上下来的。

我主动招呼他，请他过来登记。他说：“登什么记？！”，我耐心地回答说：“这里是转运站，进来都要登记，公安干警要点名”。

停了一分钟，我继续客客气气地说：“你的名字是…？”他说了名字。可惜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我又问：“什么单位送来的？”他很不耐烦地瞧了我一眼，狠狠地说：“一机校”。

我笑了一笑说：“哦！一机校，国防系统的”。随后又说：“是右派吧？”。

他把行李重重地往空着的铺板上一撂，怒目而视地对着我说：“右派怎么了？！”。

我抬起头、含着笑、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地说：“我也是国防系统的，右派，前天才来的”。

他一听，态度一下子亲切起来，快步趋近我说：“你也是右派？”，我说：“我来了两天了，这间屋里一半以上是右派”。

他用目光横扫了一下房间，好像在问，怎么这么多右派？

我招呼他坐到木板铺上来，然后问他：“才开的批斗会？”，他点了点头说：“全是乱扣帽子，一机校不讲理！”，我说：“不单是一机校，都一样，全国都一样。本来都是一家人，从来没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偏要说向党进攻，一股劲儿地要把同志说成是敌人，敌人多了有什么好处呢？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气愤愤地说：“这是为什么？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我提醒他：“小声点”。随后我们悄悄地攀谈起来，我告诉他那边的几位是西南师范大学的，对面铺上的几位是重庆大学的，还有 296 厂（建设机床厂）、256 厂（西南车辆厂）、456 厂（长安机器厂）、152 厂（江陵机械厂）等等兵工厂的。他看看了大家，怒气渐渐地消了。

他是四川体育学院毕业的，在重庆一机校（如今的重庆理工大学）担任体育教师，不明就里地被安上了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成了莫名其妙的右派分子。难怪胸中憋着一股愤懑之气，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五十多年过去了，英俊的小伙子该是年近耄耋，须发斑白了吧？如今他在何方呢？

还是这一天，刚刚吃过午饭，两个身穿干警服的看守从后院来到几乎住满了人的大房间，挨着个儿的巡视了一遍，然后逐一点着人头，“你”“你”“你”……站这边来！房间里总共四十来个人，他挑了三十个左右，全是身强力壮的。他说：“出去参加劳动，进来了就要接受改造，积极劳动，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随后对我说：“你还是组织大家学习、读报，规规矩矩的啊！”。

门口的值班武警打开了两道铁栅栏门，刚才被挑中了的“同学”陆续走到街沿的人行道上，重新站队，那两名干警清点了准确人数，不多不少，恰恰三十个。一声口令“向右转，齐步走”，队伍沿着下半城公路朝东面走去。

晚上七点，天还没黑，中午出去劳动的那些人回来了，只有二十九个，少了一个。回来的人赶忙拥到后门打饭，每人一大碗空心菜煮稀饭。1958 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刚刚起步，饥荒还不明显，粮食还没有定量，稀饭还比较稠，可以吃饱。

饭后，天已经黑了，吊在房梁上的电灯只有 40 瓦，不是很亮，也就不读报了。我悄悄地问回来的人：“怎么少了一个？”他回答说：“不知道，派我们到朝天门码头捞木材，上游发了洪水，顺流漂下来的木筏子有的被冲散了，零散的木料漂浮在回水沱，大家在齐腰深的水里把木料拖上岸，都很积极，争取摘帽子呀！只顾埋头干活儿，没有顾及左右，六点多钟上岸集合，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个。”

他接着说：“不知道是被洪水冲走了，还是逃跑了？两江汇合处水流很急，漩涡特多，在水里逃跑的可能性不大。”

我在想，要是逃跑了还可以抓回来继续“改造”，要是被洪水冲走了，可就惨了。为了国家财产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和他的年龄相近，今后的路还很长，不知道会遇见多少激流、漩涡、险滩……

第四天上午大约九点，那两位干警陪同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人又来挑人，这回是手里拿着名单逐一点名核对。先叫名字，然后核对单位、工种、技术等级。连我在内一共选了十八个人，都是技术工人或技术员，大约不是到长江里捞木头了。跟着喊收拾行李，开门列队，再点一次名。这时候我们才看见门外停着两辆大卡车，前面一辆车上已经装满了人，或立或坐，有男有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拉来的。我们依次上了后面这辆车，车厢大，人员少，不挤。此时从看守所里面开来一辆中吉普，停在我们这辆车后面。三辆车同时启动，向西方驶去，途经菜园坝、李子坝、化龙桥、小龙坎、沙坪坝，杨公桥，直奔歌乐山方向。莫非要把我们送到“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关起来吗？

要命的地方呀！不禁一阵寒慄。

曲、词各一首

胡开云

自度曲

【再回宫】 得势蛤蟆化金龙，馋涎欲滴戏玉凤，年久时深精力竭，色情空。大喝一声：给我滚！忒威风。 这边情难容，凤眼圆睁斥色龙：不让我滚就是狗，真要我滚算英雄。滚就滚！怒冲冲，转头急步脚生风。连日寂寞真难耐，顺梯下楼成狗熊，摇尾乞卿再回宫。

新翻《蝶恋花》

抛却娇杨欺骗柳，颠倒是非全靠那张口，闻讯井冈何所有？新欢日醉销魂酒。
弃妇孤灯继永昼，送走黄昏独自数更漏，忽报良人色如虎，唾飞化作倾盆雨。